

# 揭开画皮

## 目 录

### 序言

#### 第一章 彻底戳穿马克思主义的谎言

#####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

#####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批判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专制政治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专制理论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现代专制主义的理论工具

##### 第三节 虚伪的民主制度

#### 第三章 民主主义的崛起

##### 第一节 政治的本源

##### 第二节 国家的运作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 结语

## 序 言

自从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打败蒋介石并取得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以后，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大陆正式付诸实践。由于刚从战争中走来，中共还能记起他们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车拉肩扛送来的，还能理解并珍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尽管这时他们执政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不强，但他们

自觉自律地为人民做一些好事的热忱，使他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这也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人心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可惜好景不长，马克思主义作为强权政治的典范，其弊端便不断以或“左”或“右”的面目出现。继之以真枪实炮的战争结束不久，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又纷纷登场。虽然人民精神上恐惧，生活上艰难，但人民仍然天真地相信，这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必要，并虔诚地做到“毛主席挥手我们向前”。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上台。邓全面否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果敢地打开国门，使我们有机会向外看。通过纵向横向的对比，却令我们羞愧无比，痛苦万端。曾经被我们歌颂的往事，却原来是一场恶梦，“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实实在在地带给了我们一场劫难：长期以来，在精神上我们确实谈不上心情舒畅，因为我们必须处处小心，以免稍有不慎而被上纲上线；在经济上，同是在战争废墟上建立的国家，我们比日本、德国相去甚远，与韩国、台湾也难以比肩。

竟有人认为，我国幅员太广影响了经济发展。这种人数典忘祖，这是对祖宗的亵渎和污蔑。因为国大只能是优势而非包袱，况且国变大不易，国变小不难。从此，什么“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个个大大的问号在我们头脑中回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气氛趋于缓和，经济工作成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人民曾经豪情满怀，信心倍添。国人以其特有的思维定式，以为明主又君临人间。后几年我国经济建设确实取得较快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政治腐败几乎随之而生，政治剥削呈恶性蔓延。随着裙带关系、世袭制度、衙门作风、密室政治等封建主义政治倾向竞相登场，经济发展也开始举步艰难。面对于此，人民痛苦，人民迷茫，人民实在不愿意看到如此年轻的共和国就这样毁于一旦。怀着满腔热血，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莘莘学子两度走上街头，以死苦谏，希望中共迷途知返。但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终于撕下了伪善的假面具，露出了丑恶狰狞的嘴脸，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下了毒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

六四学生运动失败了，人们对中共的幻想也破灭了，人心归于沉寂。但六四的精神不会死，她敲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丧钟，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她成为世界历史上高高耸立着的一块不朽的丰碑。同时，她也促使国内有识之士以严肃、认真、冷静的态度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权。

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的理论学说和实践，我们依次思考了如下几个几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不是中国各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第二，剩余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经济剥削是否存在？第三，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胜利？第

四，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煞有介事，是否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勿庸置疑，这在中共自己的教条中都能找肯定的证据或答案。但我们首先发现第一条是不能成立的，它所谓“是”的答案不过是中共的自许。不仅如此，标榜以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为己任的共产党自己已经堕落成一个剥削压迫他人的阶级。以此为突破口，我们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是一个大大的骗局。曾经天真地相信“至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正确的”我们，最后只能宣布：必须象反掉“坚持两个凡是”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样，坚决反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

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土崩瓦解和苏联帝国的分崩离析绝非偶然，它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的穷途末路。我们相信中共肯定深明其中的道理，但中共却抱残守缺，背道而驰，顽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造就了“无私无畏”“救苦救难”的活“神”——共产党，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可以以这个活“神”自居，欺世盗名，达到自己丑恶的目的，特别是用作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专制的思想武器。四项基本原则既是中共专制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共坚持专制的旦旦誓词。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专制指南，马克思主义则证明共产党专制有理。社会主义制度是实施专制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是实施专制的工具。四者相辅相承，浑然一体。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可能会引起少数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猜忌，以为我们是资产者，怀着所谓资产阶级的偏见和敌意。相反，我们至今仍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们正属于那绝望的“无产者”，在无奈之中才反戈一击。

同时，通过对中共政权运作方式的考察，我们十分惊叹中共几十年坚持不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灌输和绝对排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侵蚀的努力是十分成功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漏洞百出，谎话连篇，但我们却曾真的把它奉为真理而不敢稍加怀疑，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剩余价值论”、“生产力决定论”等观点还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那样的根深蒂固，视为不须论证的公理。由此，我们也认识到，禁锢言论、禁锢思想的伎俩是多么的可怕，真是民主制度最凶恶的敌人。

本文不仅在于破除马克思主义的迷信，我们还力求对被中共搞得神秘兮兮的“政治”的本质进行正本清源。我们认为，政治的本源是民主，民主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必然，它超越历史，超越时代，是民心所向，是大势所趋。它是发现真理克服谬误的法宝，也是实现团结走向胜利的凝结剂。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我国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提纲挈领的分析。

坚冰即将被打破，枷锁即将被砸碎。虽然黎明前的黑暗总会更加凝重，但黎明已到，天亮还会远吗？！我们劝勉民主战士不屈不挠，继续努力；

我们敦促专制分子审时度势，认清形势。愿我们大家都能以真诚的态度团结一致，携手共进，去迎接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灿烂明天！

请将此文转给所有热爱民主、热爱自由和热衷独裁、热衷专制的人们！

吴 菊

彭功延

文 子

## 第一章 彻底戳穿马克思主义的谎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三者可谓三位一体。在 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论证工具，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治结论。

###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从不讳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是所谓“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就决定了他的学说绝不可能属于全人类，也不可能适用于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时期，它必然具有不可避免的狭隘性和盲目性。他在这部分论述中，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并据此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然而，谬论永远经不起思辩和现实的检验。

#### 一、“剩余价值”学说的经济学缺陷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最引以为自豪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一切政治观点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所谓剩余价值就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那部分价值。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归宿，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为了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搞了一大堆的概念，诸如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使用价值和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等等，不一而足。对剩余价值最具有直接意义的概念便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认为，所谓不变资本，即资本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的，在生产过程中，它只是转换了存在的物质形式，而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所以马克思把它叫作不变资本。所谓可变资本，即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再生产了自己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的余额，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变为可变量，所以马克思把它叫作可变资本。马克思由此推断，不变资本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只有可变资本才能带来剩余价值，只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或者干脆说，剩余价值本来应该归工人所有，却被资本家无端强占了。

对于马克思的无稽之谈，也许早就有人不服气了，也许早就有人争辩道，所谓的剩余价值应当是由不变资本或全部资本带来的。但究竟是哪部分资本带来了剩余价值，似乎是一个永远纠缠不清的问题。这正是马克思自以为得计的地方，对此，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有所流露。

毫无疑问，仅在这个层面上，的确说不清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各取所需。但稍微前进一步，就会立即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破绽。因为马克思压根没有考虑剩余价值可能出现负值的情况以及对负的剩余价值应作如何处理。

勿庸置疑，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企业亏损甚至倒闭的现象，与此紧密相关的剩余价值，其出现负值的情况也应是经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不会总是表现为“剩余的价值”或“扩大的价值”。也就是说，尽管按照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但具体的劳动并不一定总是创造了足够大的价值，甚至适得其反，劳动直接生产了一个负的价值。

我们不能借口在宏观上剩余价值经常表现为正值而回避微观上剩余价值出现负值的情况。实际上，宏观上所表现的剩余价值为正值也不是必然的。马克思讽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作过认真的回答，而他本人却从来没有正视过剩余价值为负值的情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致命弱点。

关于负的剩余价值的处理，我们还得演绎马克思的思路。按照他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论，剩余价值为正值时应当为工人所有，那么，剩余价值为负值时也应该由工人来负担。因为马克思曾力证资本家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没发挥过任何作用，他既没参加劳动，也没参加管理，就连监视工人劳动一类的事情也由他的工头和经理去承担了，资本家是地地道道的寄生虫。

“让工人承担亏损”的结论大概是马克思所始料不及的，当然也是自称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革命领袖”所不能给予首肯的。但这个问题谁也绕不开，而只要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头上就立刻罩上了乌云。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剩余价值为负值时由谁承担作出回答，但不等于马克思真的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为负的现象。更不等于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 没有明确的态度。事实上，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企业倒闭、资本家破产甚至跳楼自杀也象工人失业一样司空见惯。他的合作伙伴恩格斯自己也曾数次破产。然而， 马克思并未根据他的理论得出资本家在企业倒闭时应当免责、资本额应当保全的结论，相反，他却在资本家破产跳楼时在一旁手舞足蹈、幸灾乐祸去了。他显然认为 企业亏损乃至破产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应当由资本家承担。这就是马克思无赖气十足的剩余价值正负责任观。

也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可怕的东西并不是他显在的“剩余价值论”，而是他潜在的经济后果“正负责任观”。正是他患了庸俗的“红眼病”，他才编造出所谓“经济剥削”的谎言。

## 二、经济模式论

### 1、经济模式的概念

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的概念是与经济学上利润的概念紧密联系的，但由于马克思认定剩余价值只是由产业工人创造的，因此， 从剩余价值到利润，马克思转了好大一个圈，并且，正如他对剩余价值的考察那样，马克思仅考虑了利润和利润平均化等问题，却仍然没有正视与利润相对应的亏损 的存在。

为更通俗地说明问题，我们抛弃马克思剩余价值的概念而从一般企业（而非单纯的生产企业）的角度来考察利润。如果用利润代指经营后果的话，那么我们根据利润的正负将其区分为盈利和亏损两种情况。

下面我们就引入经济模式的概念，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错误，并定义：所谓经济模式就是在经济过程中，扣除对经济要素的合理补偿后，经济要素对经济后果的分配体制。在这里，经济要素有两种，即资本和劳动，其主体为资方和劳方；经济后果也有两种，即盈利和亏损。

我们无须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直接考察盈利或亏损究竟应该归劳方还是应该归资方。不难算出，根据这两两相对的四个因素，只能排列出四种不同的经济模式。第一种是盈利和亏损都归资方，我们称之为自然经济模式；第二种是盈利和亏损都归劳方，我们称之为影子经济模式；第三种 是盈利归劳方，亏损归资方，我们称之为马氏经济模式；第四种是盈利归资方，亏损归劳方，我们称之为无名经济模式。

### 2、各种经济模式的特点



之所以称第三种经济模式为马氏经济模式，是因为它是马克思潜意识里所认同的一种经济模式，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说明。但它的错误却出人意料地直白浅显。虽然它与无名经济模式迥然不同，但它们的性质却是相同的。这两种经济模式都是把经营风险和经营收益的归属割裂开来，因而违反了人的本性，这也决定了它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同样，建立在该两种经济模式基础上的任何理论也必然是荒谬的，不仅没有丝毫价值，而且只能成为人类社会的 精神垃圾。

影子经济模式虽然使收益和风险的归属得到统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存在，但无法正常运行，只能成为一场恶作剧。该模式的特点是 否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其置于似无还有似有还无的地位，于是一切弊端皆由此而生。第一，该模式不可能自发产生。因为在该模式下，投资就意味着所有权的完全丧失。投资者虽然不会为投资承担任何风险，但也不能占有投资收益。投资没有利益驱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投资的动力。这种模式的建立，只能象马克思所勾画的那样依赖于通过“革命”对现存资本实施的强制没收。第二，它不鼓励资本积累和再投资。该模式强调企业的收益全部归工人所有，任何形式的截流都是对工人的“剥削”。而积累就意味着工人分配的减少，最可怕的是一旦积累转化为投资，它所形成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样必然地与它一切形式的所有人相分离。第三，企业的亏损必须由企业工人承担，并必须以工人个人财产予以弥补，以保持企业资产额的完整，这是该模式下的企业不致日趋萎缩从而走向灭亡的根本保证。但该条绝难执行，因为由劳动者承担风险，从根本上违背权利规则。第四，企业内部不存在资本保值增值的自发机制，而必须依赖于企业外部的约束力。但由谁来实施监督，他的监督是否可靠有效？这是不得而知的。因此，该模式处处弥漫着一股死气。

自然经济模式是现实经济社会中的通行模式，它以尊重所有权和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为存在条件，并以此促进权利和自由的发展。它克服了其他模式的所有弱点，成为唯一完美可行的经济模式。它不仅使收益和风险的归属得到统一，而且还昂扬着无限的政治经济生机。第一，“谁投资谁受益”促进了投资和再投资；第二，“谁投资谁担风险”明确了责任，优化了管理；第三，自由的雇佣和被雇佣，使机会成本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劳方和资方的利益，而不是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此消彼长，相互对立；第四，由资方承担亏损，解决了影子经济模式下负盈不负亏的问题。

### 3、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迷茫

马克思迷恋马氏经济模式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马克思生活在早期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并存。在马克思看来，让资本家承担经营风险，让工人享有经营利益，那可真正称得上为工人阶级谋利益了，因此，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马氏经济模式作为其理想模式，一是希望劳动者能捞到盈利之好处，二是希望能让工人摆脱亏损之负担。用心可谓良苦，不愧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

马克思的理论确实极具有煽动性。马克思死后，共产党们特别是中共当真根据他的理论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当后来的马克思们欢天喜地地准备实施马氏经济模式时，却发现那个能替他们承担亏损的资本家早已

被他们理所当然地与“剥削”一并打倒了。但亏损现象并不因资本家的不存在而不存在，也不因马克思的未虑及而不出现。于是，社会主义者们便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并非马克思理想的影子经济模式的泥潭里。

当然，他们不可能完全套用影子经济模式。第一，任何一个稍具经济知识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该模式所特有的超分配和投资不足现象必然窒息经济发展。第二，在任何经济时代都存在亏损问题，并不会因马克思名之曰“社会主义加计划经济”而能幸免。由于马克思主义者们先天患有“亏损疏漏症”，于是，面对亏损突如其来竟是那样始料不及。由于该模式的特点就是要由工人来承担亏损，但果真明目张胆地这样做，简直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当局因此陷入长期痛苦迷惘之中。第三，现实的教训虽然教会了他们“盈亏责任对等统一”的道理，但仍然难以处理现实的亏损问题。他们一定十分希望移植自然经济模式的运作机制，却又怕染上剥削的嫌疑。加之如果承认了自然经济模式的科学性，就当然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因此，社会主义在长期的痛苦挣扎中所采取的就是那种围着影子经济模式转，却始终找不到立足点的经济模式。左的势力使它趋向影子模式，右的势力又使它靠向自然模式。但总的看来，它与影子经济模式之间才真正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关系。从后果上看有如下表现：第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特指国有企业）缺乏积累动力，企业扩大再生产往往必须依赖于银行贷款或国家投资；第二，企业内部贪污浪费严重，经营成果超分配；第三，企业负盈不负亏；第四，以低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支付工人的报酬，从而把亏损责任变相转嫁给工人。为防止工人逃避转嫁的风险，行政命令就派上了用场，比如，限制工人调入调出，强令职工入股等等。以为工人阶级谋福利为名的“社会主义”就这样开始严重损害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亏损疏漏”不仅误导了社会主义，也把整个社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双双带入了深深的误区，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深重灾难。

###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瓦解

通过对剩余价值理论和经济模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已经发现，以自然经济模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乃天经地义，而以马氏经济模式为蓝本、影子经济模式为依托的社会主义则名不正言不顺。在自然经济模式下，只要人与人之间是平等自由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互惠互利的，所谓的经济剥削是不存在的；而在影子经济模式下，人完全或部分地失去自由则是必然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到底谁必然灭亡谁必然胜利，答案不言自明。光辉的一九八九年也以斩钉截铁的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也由于经济剥削并不存在，决定了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能是子虚乌有，“无产阶级革命”也只能是罪恶的拨弄。虽然历史上也曾发生过“革命”，但“革命者”从来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贫富差别总是存在，但贫富的结果往往是与自己的努力息息相关的。个人不主观努力而陷入贫困，无端怨恨他人嫉妒他人不仅徒劳无益，而且缺乏良知。那么，历史上引起革命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另外，马克思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所谓的“固有矛盾”，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工人失业，贫富悬殊，社会混乱，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等，并宣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其实这些都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换之初的必然现象，随着人们对这些现象的认识不断加深，防范能力不断增强，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已越来越少，它们所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小。与此同时，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出现却越来越频繁，其危害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当局从最初不承认有这些问题发展到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存在。这是怎样的讽刺！

现在，计划经济体制已经灰飞烟灭，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私有经济的禁令基本解除，私营企业开始有所发展。尽管国有经济还在影子经济模式的浓雾笼罩之中，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神话已经打破。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尚未在中国倒下，但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几乎已无容身之地。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民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出的选择，自然经济模式必将走向全面胜利。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象其政治经济学一样，同样标榜属于“无产阶级”。作为少数人或者不知什么人专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充满谬误和偏见，而不可能象它自命的那样成为“科学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马克思把一个十分无谓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或称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并以对两者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不同回答作为划分所谓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水岭。他认为他是属于唯物主义的阵营，并坚决反对所谓的唯心主义。他还认为他的观点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包括：第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第二，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人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他强调，人类社会的运动也是有规律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更迭变化，或更确切地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第三，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阶级斗争则是人类社会在存在阶级的历史阶段保持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为此，他极力鼓吹“暴力革命”。

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他继续发挥他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所坚持的各种观点，认为，第一，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派生物。第二，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第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是客观的普遍规律，并再次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结论。第四，继续进行阶级分析，继续强调各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五，把国家看作是经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独占的、统治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第六，大肆鼓吹暴力，并认为“暴力是每一个临产

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形式。第七，大谈人性，力证无产阶级具有超凡入圣的人性。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归纳起来还是一个目的，即证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客观规律，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合情合理，无产阶级必然是未来社会的主宰。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还比较单纯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就显得盘根错节，扑朔迷离。不仅微观层面上错误百出，更严重的是在宏观层面上它异化了哲学的主旨，偏离了哲学研究的方向。

## 一、哲学的基本问题——人与世界的关系

哲学，无论是哪个派别的哲学，一旦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便标志着这个派别的哲学已步入严重的误区。因为在这一个哲学体系中将“人”置于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中，究竟人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成为一个不置可否的问题。如果说人是物质和意识的复合体，那么，在物质意识的关系中却没有这一“极”，说不清楚人与物质和意识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在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中，根本没有人的位置，形成一个人的空场。这就决定了这样的哲学必然毫无意义。

事实上，哲学不应是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哲学，而应当是关于人的哲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应当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人与世界的关系，显然不是那种严格的相互对等的关系。人总是以主动的行为影响着世界，以追求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使世界的存在状况更适合人的生存。总的说来，人与世界的关系集中表现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两个方面。

### 1、人和世界

人是物质和意识的统一体，人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能力。除此之外，必须首先明确怎样看待哲学范畴中的人，是以群体还是以个体？这必须根据哲学的任务特点来确定。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人的活动提供方法论，以指导人们正确地与世界发生各种联系。而人的活动总是以单个的人（自然人）或单个的组织为单位进行的。因此，这里的人必然指的是单个的人或单个的组织。其中，组织是由多个人组成的，但其行为如同一个人，有统一的思想 and 行动，它与非组织化的人的群体相区别，因此，组织也可以称为复合人。单个的人或单个的组织，我们统称为个体人，它是我们哲学体系中的主体。

在界定了人的涵义以后，世界的涵义随之确定。它是指除这个“人”以外的其他所有人以及除人以外的其他所有存在（物）。由此，世界就可分为两部分内容，我们把由人构成的世界称为主体世界，把由物质构成的世界称为客体世界。

### 2、人认识世界

认识能力是人特有的能力，是人成为万物之灵的原因和标志。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是因为人有着发达的感觉器官和卓绝的思维器官。

人认识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作用于人的过程。没有世界对人的作用，也就没有人的认识过程。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渐进积累的过程。

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在人脑形成三种类型的认识（或称意识）。第一，外在世界的存在状态反映于人的感觉器官，在人脑形成事物的“存在特性认识”；第二，外在世界存在状态的变化以及引起变化的诸因素共同反映于人的感觉器官，在人脑形成事物的“联系特性认识”；第三，在人的认识形成过程中，还形成一个关于人自身欲望要求的特殊认识，我们称之为人的“自在意识”。具体地说，自在意识就是人希望外在环境尽量满足自己的要求，尽量使自己的生存感到舒适的关于外在环境存在状态的理想。自在意识随着人们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而不断调整发展，并反过来成为促进人们进一步认识和实践的动力。

由于人们所接触的世界的方面各有不同，因此人们的认识所反映的世界的内容也就不同。也由于人们接触事物的机会不同，以及人们反映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差别，特别是当先进的认识工具用于人们的认识领域后，更拉大了这种差距，造成对同一事物的本质的把握程度不同。更由于同一事物对不同人的利益影响不同，因此，即使对同一事物取得相同的认识，但人们对它的态度评价也不相同。对不同事物的认识结果不同是正常的，但对相同事物的认识不同，不同的认识之间就有正确和谬误之别。因为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就在于它的存在特性和联系特性的特殊性和唯一性。因此，正确的认识应当具有唯一性，除此之外的其他认识要么不正确，要么不十分正确。人的认识正确的标准是主观符合客观。

### 3、人改造世界

所谓人改造世界，更严格地说应当是人对世界有目的地施加影响。人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人智力和体力的支出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作实践。

外在世界的存在状态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形成人的存在特性认识，存在特性认识和自在意识进行比较，存在状态不能满足自在意识的差距，在人心理上产生不满意情绪，并促使人力图缩短以致消除这种差距。克服差距的有效途径就是人实施的实践活动。人们实践的目的在于使事物当前的存在状态发生变化，并成为人们所预期的那么一种存在状态。在实践中必然要应用到人关于事物的联系特性认识，并根据联系特性认识优选实践方案，确定实践参数，最终形成人的实践方案。这一在人脑中的实践方案（它属于认识的一种形式）一旦付诸实施，就是将这些认识或者说是信息通过神经传输到人的运动器官，运动器官直接或通过工具对外界事物发生物质性作用，从而实现对外在世界的改造。

### 4、人认识和改造两类世界的不同特点

前边，我们把世界区分为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两种类型，由于两类世界的内容不同，因此，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这两类世界的方式方法上就必然有所不同。

### (1) 对于客体世界

一般说来，客体世界中的各事物，其存在变化的特性是稳定的，它不以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人们关于客体世界的正确认识也具有稳定性。人们按照自己的认识所实施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上能够取得成功，在另一个时间空间上也能取得成功。当然，一个实践活动的成功，有赖于人的多方面的正确认识，一个实践活动的失败，决不意味着相关的所有认识都存在错误。实际上，导致一个实践活动失败的原因，往往并不是因为对事物的联系特性认识上的错误，而是在于对事物的存在特性认识上的失误。比如对材料、元件的可靠性把握不准等等。

另外，人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是人到客体世界单方向施行的，不会遭到客体世界的反认识或反实践。尽管人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和实践都可能遭受失败，但都属于人的失误，不是客体世界有意识的“反抗”。

### (2) 对于主体世界

无视主体世界的哲学地位，或者将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混为一谈的倾向都是严重错误的。人除与客体世界发生联系外，更经常地与主体世界发生联系。只与客体世界发生联系而不与主体世界发生联系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人与主体世界发生联系的中心内容是为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利。

主体世界的构成是人。认识人比认识物要来得困难。其一，认识人的关键不在于认识这个人的相貌，而在于认识这个人的思想；其二，人的思想和人的相貌并不一致。人的思想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不是他人的感觉所能容易企及的；其三，人的思想经常发生没有固定规律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特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

另外，人对主体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是双向的。别人是自己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同时自己也是别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

把握人与主体世界联系的特点，最主要地用于对主体世界实践方式的启示上。其根本含义是，人对客体世界可采用“改造”这一实践形式，而对主体世界则不成。因为你改造别人的行为，会引起别人改造你的正反馈效应，以致人们在相互改造过程中不仅没有所得，反而大有所失。人在主体世界中的实践活动应采用“协同”这一形式。

### (3) 人协同主体世界的方式

人与主体世界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主体世界实践的目的，应旨在调整修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减少摩擦，增进团结，增强人们改造客体世界的能力，使整个世界的存在更加符合人的自在意识。

在人与人之间某个具体的关系体系中，最好能达到双方都能满意。但令人遗憾的是，结果常常是不是这方不满意就是那方不满意，甚至双方都不满意。这就引

起不满意的一方调整双方关系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调整应该保持在使双方的认识进一步协调的领域内，在认识领域寻找尽可能令双方都能满意的平衡点，而不是直接进行相互的人身攻击，或以武装暴力相威胁。

寻找平衡点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自行达成协议，这是主动型的；二是双方当事人不能自行达成协议，这就必须依靠一种外在的、人们普遍认可的行为规则来指导、规范和裁判。这是被动型的。

一般地，我们把这些行为规则称为“理”，当理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时，它便上升为法。理的操作对象是权利，理能服人的原因是公平，处理纠纷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理不是客观存在，它是人思想活动的成果，并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理应当具有普遍性和明确性的特点。所谓普遍性，即理的内容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所谓明确性，即理的内容要求条文化、具体化。人协同主体世界的活动内容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定理，二是遵守理。

理不是少数人自命的，未得到多数人认可的理不成为理。理确定后，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合理也不是自命的，必须由超脱是非之争的第三者据理作出裁判。

## 5、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中，实践占据首要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概括说来就是：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我们认为，在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中，实践确实在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实践的哲学地位不能高于认识，而应是相反。

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作为动词性的认识和实践分属于形成认识（名词）和应用认识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认识是实践的基础和主导，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没有有效的实践，不仅不能达到人们的目的，反而会与之相去甚远。

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特有的能力，其根本原因是人具有认识能力。人没有认识能力就与其他物质无异。认识能力是实践能力的基础，正确、全面的认识是决定实践成败的关键。

认识和实践的动力共同来自于人的自在意识，同时，满足人的自在意识也是人认识和实践的最终目的。认识是思想手段，实践是物质手段。但实践的目的以及对实践结果的评价都是主观的，加之实践的依据是认识，因此，实践又可谓从认识到认识的一个环节。

分属于两个阶段的认识和实践，认识的直接目的就是认识，实践的直接目的就是实践。我们特别把科学实验归结为认识的范畴，并把实验看作是丰富、发展和检验人们认识的物质手段。科学实验不应象马克思主义者所划分的那样，把它视

为实践的一种形式，它显然与应用认识的实践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另外，观察、学习、思考都是认识的过程。不可否认，实践是认识的又一来源，但在认识过程中所达到的形成认识的作用比较来看是十分次要的。把实践作为认识的重要甚至首要的来源是完全错误的。人的认识的来源以及检验、发展认识的手段都主要存在于人的认识过程内部，否认这一点，等于直接否认了人的认识能力。

实践要坚持“认识在先，实践在后”的原则。认识上不成熟，不能急着实践。多年来，我们受“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教条的毒化，搞边实践边认识，拿实践当儿戏，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交了太多的“学费”。其间教训，要求我们把学与用区分开来，把实验和实践区分开来。

认识在先，意味着认识不一定基于实践上的迫切需要。特别在基础学科领域，认识的发展往往远远超前于实践的要求。而人在基础学科领域的认识兴趣不减，其动力何在？显然是“好奇心”、“求知欲”发挥了作用。当然，在应用学科领域，认识和实践关系十分密切，实践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应用学科的发展。

认识的类型有两种，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发现就是在世界中探寻事物的存在状态以及事物从一种存在状态到另一种存在状态发展变化的现象，并探讨其发展变化的机理。由于人的生物适应性比较小，任何事物的变化倾向对人都具有两面性：有利或有害。许多事物的变化是自然的属性，它本身无“心”对人有利或者有害。有利或有害是人的主观评判。如果说哪种变化只会给人带来好处或只会给人带来害处，那是不切实际的谎话。事物变化的两种倾向，不因人的好恶而存在或消亡。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消亡的也不一定是没落的。所谓合理、没落毕竟不是客观上的反映，而是主观上的判断，是以主观的好恶为标准 and 尺度作出的。实践就是在发现某种变化倾向并掌握其机理后，创造条件重复这种变化，控制变化的趋势和幅度，促使其向有利于人的方向转化。发明就是根据从发现中获得的认识，促成事物向有利于人的方向转化的思想方法和物质手段的集合。

正如我们不能指望实践成为认识的重要源泉那样，认识正确与否也不能过多地指望用实践去检验。首先，在自然世界中发现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变化的现象一旦得到确认，那么在同等条件下重复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是不必再有怀疑的，因此，有关这方面的认识不必再行检验。其次，在实践中如何保持同等条件往往是一个重大问题。有时尽管条件变化不大，但已足以引起实践结果发生质的变化。这常常是由于人们关于事物的存在特性认识不够准确所致。但人无论怎样谨慎，在对事物的存在特性的把握上都可能存在失误。若以实践去检验人的存在特性认识，则完全背离了人的目的，也不会对人的认识产生多大贡献。除此之外，实践还有个效益和效率问题。实践从目的到结果用什么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方案优选。实践方案往往并不涉及新的理论知识，而是对原有知识的综合运用，但其技术性相当强。对于多个实践方案，孰优孰劣，必须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难以决断时，可以进行科学实验。不可否认，实践本身也具有实验的性质，实践活动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对实践方案的优劣也作出了不折不扣的评判。这种情况属于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但实践的目的绝不可沉醉于这一方面。

把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科学意义，它不过是重物质轻意识症的又一次发作。实践成功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认识全优，实践失败也不意



味着相关所有的认识均告失败，特别是在一项实践失败后便匆忙宣布此路不能，不肯重新进行一次新的尝试，把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作用绝对化，甚至把在存在特性认识上发生的问题无端归结到联系特性认识的失误上。这是非常有害非常错误的。

实践成功的意义几乎根本不表现在认识方面，一般也不对认识带来发展。实践失败倒是往往会引起人们对实践失败原因的探讨，以便吃一堑长一智。但这种情况下的“长智”我们当尽量避免。

实践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对事物联系特性认识上的失误，特别是事物在某一具体条件下本不具有某个联系特性却强以为有，盲目蛮干，幻想在实践中出现奇迹。二是对事物存在特性认识上失误。三是在主体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无视主体世界内部的联系特性与客体世界内部的联系特性在性质上的差别。物与物之间的作用，它们的联系特性是稳定的，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特性是不稳定的，带有较大的偶然性。所谓战争、专政都是幻想以物与物之间稳定的联系特性代替人与人之间不稳定的联系特性，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争端。这实际上是非常幼稚的。强权不能代替真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四是人们实践能力比如在能量上的不及。即使认识正确，能力不及也惘然。

我们坚持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存在于人们的认识过程内部，并不断由新认识补充、发展、完善旧认识。在认识问题上，要解放思想，尊重实际，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敢于进行自我否定，而不可抱残废守缺，更不能以自己的一套压制别人认识的行为。谁这样做，谁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

## 6、探讨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意义

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并不想因此探究到底是人决定世界，还是世界决定人。“决定”二字根本不适于涵盖人与世界关系的意义，更不能把对这样一个荒唐的问题作怎样的回答作为超乎一切学术观点的根本原则问题。

事实上，自从人产生以来，世界就不断地按照人的意志改变着模样。尽管如此，人在世界面前，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绝对的自由，都要受到世界的约束。人们改造世界必须以尊重世界为前提，要驱之以道、使之以理。同样，尊重世界也不意味着人们在世界面前无能为力，相反，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都在日渐增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温存。

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两个方面概括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部含义。人作为这个关系体系中的主动因素，处于更为关键的地位。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是人特有的能力，而人的认识能力则处于主导地位。认识是人们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

研究人与世界关系的意义，就是为了总结人与世界关系的历程，突现认识的特殊地位，并解决人的认识机制问题。这也是哲学、特别是纯粹意义上的哲学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以往的哲学，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政治哲学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它们在人的认识史上都不同程度地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它们的特点都是过分相信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把它奉为天条真理、金科玉律，以致迷信它们的人们根本不去想、也不允许别人去想这些观点也是人的主观认识，其正确性也具有相对性，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别是这些哲学与宗教势力、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他们以“正统”压制“异端”，大肆进行愚民宣传，恶毒排斥新鲜空气，疯狂打击迫害进步势力，其危害之大无与伦比。

也可以说，人们的认识道路上充满了荆棘。人们的认识固然受到人们的认识手段、实验条件等的限制——这是正常的。更可怕的障碍来自于人们的认识内部，来自于人们僵化保守的思想意识和鄙视、排斥、打击、迫害进步思想的组织体制——这是人为的、反常的，是人们必须注意克服的。

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起蓬勃向上、不断推陈出新的认识机制。它不是哲学研究的直接结论，却是哲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它是关于认识的认识。认识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的地位，认识的特点，丰富、发展、检验认识的途径和手段，阻碍认识发展的因素，促进认识发展的政治思想条件等。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我们不必重复我们的观点，相信读者已从上边发现了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答案。

认识具有向“正确轨道”回归的天性。错误的认识不可避免，也不见得十分可怕，在正常情况下也不一定会造成重大危害。健康的政治环境就是确保言论自由，它具有无可争议的纠偏机能。牢牢把握认识的方向，认识自然，认识人性，改善人们的物质条件，和协人们的相互关系，共同增进人类的福祉。唯此，认识无忌禁。我们呼吁：高扬认识的大旗，解放思想，广开言路，和平争鸣，自由取向，倡导科学，实行民主，事实检验，修正错误，尊重知识，大办教育。

哲学的第二层次的问题才是关于世界、关于人的具体看法，而这些看法还要经常回到认识机制中去修炼。

也可以说，认识机制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是次要和辅助的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其哲学地位超越认识机制。以其他问题压制认识机制是本末倒置，是哲学的痴迷。

## 二、物质——意识哲学体系的谬误

按照我们的观点，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问题是哲学的第二层次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也赞成（客体）世界的物质性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把物质定义为“客观存在”，既然能被感知，莫不是客观存在。关于世界的物质性问题上，一般不会引起其他不同看法。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存在，等于直接否认人自身的存在，这是一切精神正常的人所能理解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再煞有介事地讨论世界是否是物质的问题显然有故弄玄虚、装腔作势之嫌。

尽管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它不恰当的以物质决定论为主导的哲学观给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所带来的混乱是严重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根本无心也无能于物质的深入研究，物质的概念最终被一种主观的政治学说所玩弄。

另外，马克思主义还对意识的起源和本质作了探讨，我们认为这也是必要的。但马克思主义显然只从人身上发现了意识，又只从人以外的世界发现了物质，这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物质、意识的分离和对立。

## 1、意识、物质

由于马克思主义指明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使得人们对物质的把握比较容易。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指明意识的“唯一特性”是什么，或者说它没有指明人们应当如何把握意识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关于意识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两条含义：一、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二、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可以认为这两条见解基本是可以接受的，但却过于失之简单。

我们认为，人是物质和意识的复合体。显然，物质不是人的独有特性，那么意识是不是人的独有特性呢？当然不是。意识不可能是人脑产生的什么不可名状的精灵。

构成人体的物质我们通常称之为有机物，自然界的其他蛮荒物质我们称之为无机物。如果我们把人的意识称之为“有机意识”，我们相信自然界中必然存在着那么一种简单的“无机意识”。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以多种方式和强度对周围其他事物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会不同程度地产生效果，并固化在其他事物上，这就可以认为其他事物已经具有了记录这一事物存在的“意识”。它与人的意识相比，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外在的。意识的本质就是物质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留下的物理化学印记。没有相互作用及变化，无论怎样的存在都不可能给他事物留下自己存在的意识。不理解意识的这一本质，只承认人有意识，否认意识的普遍性，与只承认自己有意识、否认他人有意识是一样的狭隘。

人的意识的产生是这样的：外在事物的影响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先在人的感觉器官直接地产生物化感应，然后感觉器官通过神经纤维把这种感应传递给人脑，并在人脑再次形成一个物化记录，这就形成了意识。当然，人关于自身的各种感受也会形成意识。人感受事物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直接接触——人身上布满了具有感觉职能的神经末梢，二是通过光、声等媒介的间接感受。尤其是借助光通过人的视觉器官感觉到事物最多，也最准确。尽管如此，宇宙中表明事物存在的许多信息介质是人们无法直接感受的，甚至人们至今还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人的意识是高级意识，还表现在人脑能对人感觉器官感受的信息所形成的意识进行意识加工和处理，使意识的质量再上等级，使之更加符合客观存在的状况及

联系的特性，直至产生一个控制身体运动的意识，使人体有意识地运动。这个过程是奇妙的，但它并不神秘。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也是物质的机能。特别有意义的是，电脑、机器人这些无机物质已经能够模拟人的意识。尽管电脑的工作原理与人脑不同，尽管机器人在许多方面无法与人相比拟，但它们的出现对于人们加深对意识本质的认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孤立地从人的角度看待意识，苛意强调电脑与人脑的不同，以致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的认识一直裹足不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神秘主义色彩。

我们把意识的本质解释得如此简单，可能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这甚至要比当初把人体的物质本质等同于一般无机物还要令人感到震惊。人的意识的确是复杂的、不同寻常的，而人的物质本体只能说更复杂、更奇妙。人的物质本体已不再神秘，相信人的意识也不会长期神秘下去。二者统一于人体，又必然同时具有普遍意义。或者说，世界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意识的。物质表示存在，而意识表示各存在之间发生过相互作用的信息。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信赖于人的意识但能够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其局限性表现在：第一，它蓄意强调物质与意识的对立，并特别指明“不信赖于人的意识”，实际上却成了以人的意识为标准，一刻也绕不开人的意识。第二，“能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立意，没有注意到人的意识的反映机会和反映能力是有区别的，而且人的认识能力又是不断进步的，这就把物质打入了主观的和历史的范畴，脱离了物质“客观实在”的本质。使用这样的物质概念，使得人们往往比较容易接受一般物质存在的事实，而对一些特异物质现象——常常只能被少数人的意识所反映——则不能正确对待，不承认它们的物质本性，甚至将它们打入“唯心主义”的冷宫。

从现代科学的经验来看，物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我们称之为实物质，如各种实体物质；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我们称之为虚物质，如各种物理场。对实体物质的研究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但对虚物质的研究不过刚刚起步——尽管现在已取得不小的成就。从现在科学的研究成果看，虚物质是由实物质发出的，含有实物质存在的信息。虚物质和实物质的存在和运动特性是有重大区别的，这在宇宙天文学的观察中可见一斑。一颗星体，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宇宙中仍然以虚物质的形式保留着它以前存在的信息，人们通过某种方式还能感知它的存在。这种信息就是它的“灵魂”。它是物质性的，当它对其他事物产生某种影响时，它又是意识性的。

## 2、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和意识是截然分离的，而意识所指的要么是人的意识，要么是神的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否定了神的存在之后，意识仅指人的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对于前者，马克思主义并未明确指出物质究竟决定意识的产生还是决定意识的内容。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似应理解为二者兼而有之。对于后者，其含义包括意识能动地反映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并且，前者是唯物主义的核心，后者有点向唯心主义渗透，是对唯物主义的“辩证”。

马克思主义显然没有正确把握意识的本质，因而过分地强调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在我们看来，物质和意识是统一的，因此，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错误的。但相比之下，以“意识决定物质”为特征的唯心主义的错误更加明显，而以“物质决定意识”为特征的唯物主义的错误则比较隐晦。马克思主义正是以揭批唯心主义的错误来反证唯物主义的正确，其实这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论证无聊得要命，而且牵强附会。它将意识仅看作人或神的属性，然后问何者为第一性，即谁在先谁在后，或者说谁是谁的产物。显然，神是不存在的，而人是“后天”的，于是得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结论。它宣称坚持这一观点的就是唯物主义，相反就是唯心主义。并抓住唯心主义的纰缪，大肆进行抨击，以此树立唯物主义。

至此，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它还要继续分析谁决定谁。与“第一、第二性”相联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物质决定意识”，在此基础上再补充说“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事实上，无论“决定”的涵义是什么，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到“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基础都是不存在的，极其缺乏有机论证的环节。试看马克思主义为“物质决定意识”论所找的四条证据：一、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二、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三、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四、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前两条反映了意识的起源，后两条反映了意识的本质。

实际上，即使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把意识看成是人脑的机能，仍然不能得出“物质决定意识”的结论。第一，物质并不决定意识的产生。尽管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有物质存在的地方却不一定有人的存在，因而更谈不上人的意识。事实上，宇宙中物质的存在是普遍的，而人的出现却是偶然的，甚至地球上人的出现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第二，社会的主体是人，意识又是人的根本特征，因此，“意识是社会的产物”只能理解为“意识同时又是社会意识的产物”，这也否定了只有物质才决定意识的主旨。第三，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表明了意识的内容与客观存在之间不存在什么对等关系，既然如此，何敢用“决定”二字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因此，“决定”之说本来就子虚乌有。

我们称马克思主义是把意识看作是人的根本特征或者说是人的抽象对等物是不冤枉它的，而且还帮它解了在物质——意识体系中寻找人的位置之围。既然如此，那么，作为（个体）意识对立面的内容显然不只有物质，而且还有（其他个体）意识。除非把整个人的社会作为一个意识整体去看待世界，才会有单纯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但这种极端的情况并没有多大意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中也流露出它并不是这样的态度。

假如我们把物质理解为客体世界，把意识理解为人，那么所谓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就如同我们所谓的客体世界和人的关系。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共同构成一个完

整的世界。因此，即使把意识理解为人，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在关系构成上也是片面的、不完备的。

既然我们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归结到世界与人的关系中，我们就会发现被马克思主义视为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处于从属地位的“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论才真正应该处于物质——意识关系体系的核心，并从“反映”和“改造”两个方面完整地涵盖了物质——意识关系的全部内容。

“物质决定意识”的命题是强加的，是反自然和非客观的。

### 3、物质决定论的实质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论荒谬透顶，但人们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往往还不能发生其险恶用心，还以为其不过是在胡扯淡，对其善恶也无意细究。但到了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到了它直接引用“物质决定意识”论来推导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它就是要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思路，进行阶级分析，并进而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是由物质决定的，是超意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恰当地使用了“决定”这个概念。让我们再仔细回味一下“决定”的涵义。按照一般的逻辑观念，只有因果关系之间存在着唯一性方能称得上“决定”。马克思主义当然也需要这样理解“决定”，它众多的“必然”信念都是由此派生的。遗憾的是，从物质到意识根本不存在这种“唯一性”。物质的形式是纷繁复杂的，意识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试问，到底怎样的物质决定了怎样的意识？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们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没有马克思就根本不会提出的问题。可以断言，物质和意识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可谓马克思主义对自己这种观点的无奈坦诚。同样的事物反映到不同的人所产生的直接意识就可能大相径庭，而在其后人的意识还要经过加工处理，产生发展变化，因此，即使是内容曾经相同的意识也会毫无规律地变得不同，更何况意识的另一个来源是社会，是他人的意识，这就使得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就更加捉摸不定。

这样的分析决不是吹毛求疵。“物质决定意识”既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大严肃的问题提出来，但马克思主义却显然又十分不慎重，它满足于含含糊糊、懵懵懂懂。

也许有人会说，富人和穷人其言谈举止、思想方式、气质风度迥然不同，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文化或文明差异也十分明显，这不正说明物质决定意识吗？那么，你为什么不想想，代表穷与富的财富不正是由人创造和支配的吗？你不动脑筋，财富会从天而降吗？

也许马克思主义者会争辩说，物质决定意识的真正含义是意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它具有唯一性，因此即具有“决定性”。这似乎很有道理，但却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一见解本身既不能引导人们一下子就得到正确意识，也不会有助于

人们在纷繁杂芜的意识中鉴别意识的正确性，更不能说有这样观念的人，其学说体系就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

由于“物质决定意识”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客观过程，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世界里，“物质怎样决定意识”实际上是由那么几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少数魁首的意志决定的，只是盗用了“物质决定”的名义。由于没有人能定量地说明物质决定的过程，因此诸如资本家、地主以及贫下中农的标准都由他们任意划定，直至“今天是社会主义，明天是共产主义，后天又成为‘初级阶段’”全都凭他们个人的意志。

唯物主义具有极大的政治欺骗性。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论的目的，就是用来证明资产阶级的必然腐朽和无产阶级的必然先进，并据此把历史解释为既定的，把无产阶级革命断言为必然的。无产阶级不仅自己要革命，而且一种物质力量决定了他们不得不革命。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所讲物质虽然说起来实在，但具体到对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却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它到底在哪里，以及它发挥“决定”作用的过程和机理。因此，这种“物质决定论”与“上帝决定论”在本质上没什么两样。唯物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是一丘之貉，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手创立的“物质神秘主义”。

### 三、论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在认定“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之后，又对物质的属性作了阐述和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是运动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认为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就没有把握住规律的根本涵义。

#### 1、什么是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就是物质运动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规律是物质相互作用过程中因果之间的必然确定性。它体现在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而不是体现在物质的运动过程中。物质运动过程本身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假如存在什么必然联系的话，就实际上否定了联系本身及联系的多样性和普遍性。

#### 2、规律的特点

通常认为，规律是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它不是浮现于事物的外部和表面，而是隐藏在事物的内部，人们只有通过反复实验仔细观察，深入到事物内部并借助于抽象思维才能发现。规律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规律又叫客观规律。

物质在运动过程中，在没有受到新的外力作用或受到的外力作用能够相互抵消不至破坏原来的平衡状态时，其运动轨迹具有可把握性，这似乎就是“规律”，而且我们通常确实称之为“规律”，但这种“规律”与“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性质上有着根本不同，因为这种“规律”是完全有可能受人的意

志影响的。因此，“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不存在于物质的运动过程中。

据此，规律按其性质不同，可以区分为运动规律和联系规律两类，只有联系规律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运动规律和联系规律之间有着不可混淆的差异。

### 3、任何具体事物的运动都不存在“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教条通常举例说，万有引力定律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正确的，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两物质相互作用过程中吸引力与物质的质量和距离之间的关系。但又举例说，日月星辰按一定的轨道运转，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以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是客观规律，则大谬矣。日月星辰按一定轨道运转是星体之间按照万有引力定律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只是一种客观现象，虽然这种现象的确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但不能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就是客观规律。尽管日月星辰的运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由于受宇宙中诸多因素的影响，日月星辰也在不时变换着运行轨道。月球也正以每年三厘米的速度离开地球，如果人类不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态势，月球有朝一日将一去不回，那时，谁还能指望欣赏月圆月缺的规律呢？现在，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造地球卫星早已发射升空，没有人怀疑它的轨道正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确定的（当然不是任意的）。而月球的逃逸会给地球上人的生存造成灾难，它的脱逃趋势也必然会受到人的有效制止。由此可见，日月星辰的运转并不是什么客观规律。

因此，我们说，任何具体事物的运动都不存在什么客观规律。人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可以运用客观规律，对其他事物发生物质性的作用，改变事物的原来的运动或存在状态，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显然属于具体事物的运动，它绝非超乎人的影响之外，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正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果。人类社会作为具体事物，其发展要向何处去，并不存在什么客观规律，也根本不能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

那种强论“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人，必然已堕落成“拉普拉斯妖”。

### 四、论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指事物内部对立着的两个方面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关系，即对立统一，并举例说，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上下、左右、新旧、前后、大小、轻重、长短、高低等都是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而发展就是旧东西不断死亡、新东西不断产生，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向前运动变化的趋势。



显然，马克思主义是想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运动、变化、发展、矛盾等名词作为客观的概念来考察的。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这些概念的内涵中渗入了过多的主观内容，从而使他们的论证变成了非驴非马的东西。

### 1、矛盾论在客观方面根本错误

从客观的角度讲，他事物对该事物的作用是该事物变化的源泉。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同一事物不同时期由于所受的外界作用发生了变化，该事物的状态发生了变化；二、同类事物由于自身的条件不同，也由于所受的来自其他事物的作用不同，同类事物在同一时期的外在客观表现也就不同。这些状态在客观上虽有差别但并没有什么矛盾，这种状态上的差别本身既不构成统一也不构成对立，更不能成为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变化的原因只能来自于事物的外部，而不是来自事物的内部，这就象物质运动状态的改变一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一样，这是物理学的基本常识。

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实际上属于主观的范畴。因为构成矛盾的方面如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发展与倒退等都是主观的，并且其判断程度也会因人而异。也可以说，人们所使用的一切形容词都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感受所表达的主观认识，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结果，他所参照的是他自己的好恶。由于人们认识程度的不同或所处的利益处境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见解经常出现截然相反的态度。这时，如果仅强调自己正确，一味排斥他人意见，甚至斥责别人为“落后”、“反动”，那么其态度就是不科学、不老实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还有一个常用的名词叫“新生事物”。什么“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等，都不过是些文字游戏而已。可以想象，纳粹党也可自命为新生事物，希特勒在地狱之中也可以“光明、曲折论”聊以自慰，但这是怎样的笑谈！！

因此，这样的矛盾论没有什么意义。

### 2、矛盾论在主观领域尚可牵强

如果承认发展和矛盾都是主观上的概念，那么，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还能谈得上一点哲理上的意义。但这也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主观要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这种矛盾给人心理上产生焦虑，激发人们改造客观的愿望，并通过人们物质性的实践活动达到改造客观的目的。这种矛盾是积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矛盾本身，而是人们的物质性活动。二是主观愿望彼此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消极的。解决这种矛盾应力求避免采取物质性的相互改造，而应加强协商，求同存异，妥善解决。

### 3、“阶级斗争动力说”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不仅没有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要素，而且还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它的阶级斗争动力说更称得上是一种罪恶。

阶级矛盾，无论其典型还是非典型，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应主要通过“理与法”的途径予以解决。人与人之间应尽量避免斗争，更不要轻易诉诸战争。因为战争对参战各方都无例外地是一场灾难。尤其在当代，战争不仅能够毁灭敌方，也能够毁灭自己乃至全人类。

实际上，由于经济剥削并不存在，因此，经济上的阶级斗争也就本来不存在，但政治剥削、官僚阶级对平民阶级的权力剥削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大部分是平民阶级反对官僚阶级专制统治的斗争。只是越到近代，这种斗争的内容越是渗入了“争民主”的成份。这种斗争会一直持续到民主制度的彻底实现。

## 五、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一生中另一个“最伟大的贡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理论基础。不难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过是物质决定意识论的简单类推，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里的必然产物。毋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更是一错到底。

### 1、在社会领域最根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和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一脉相承，其错误基本相似，但更有新的特点。前面，我们通过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分析，彻底批判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同样，我们还要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原理，再次批透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前面我们是从自然的角度的话，下面我们将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这一关系。

我们已经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无外乎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两个方面。在社会领域，这一关系将着重体现在协调人与人之间（主体世界）的关系，减少内耗，以提升人认识和改造客体世界的总体能力，共同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这也是人实行社会化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概念含混不清，他有意强调社会意识和意识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而实际上这种差别是不存在的。我们也已指出，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其意识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有实际意义的做法只能是以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集团为单位去考察。事实上，马克思一直也是这样做的，这就从客观上把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社会意识与其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的意识概念统一在了一起。

在关于对意识以及对“意识是社会的产物”的理解中，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不是其他存在（物）的社会，人是社会的有机构成和主体。如果把意识看作是人的抽象，那么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等同了意识与意识的关系，但这样的抽象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

由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根本没有意识与意识关系的框架，因此他就不知道怎样正确地考察历史上社会中的意识问题，结果使得他对历史的考察陷入了

他错误的物质——意识关系的怪圈。他根本没有想到在社会领域物质——意识关系模式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他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论根本没有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马克思试图以此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这种努力实在是徒劳无益的。

## 2、社会存在是人的附属物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存在和物质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它对应于我们所谓的客体世界。在这里，我们把存在分为两类，一类是未被开发利用过的，我们称之为原始存在，一类是已被开发利用过的，我们称之为人化存在。原始存在一经被人开发利用即成为人化存在，人化存在是人认识和改造原始存在的结果，是人的物质附属物。在人化存在中，最典型的是生产工具，它可被视为已人化为人身体的一部分，是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延伸，是人们象支配自身一样可自由支配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显然不是工具支配人，甚至也谈不上什么工具对人的反作用，更谈不上工具决定人、决定人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方式等等。

一切社会存在都是人化存在，是人化存在随同人进行社会化的结果，并在这个过程中给人化存在打上了“所有权”的烙印。“所有权”与“生命权”同质地归属于人，这也更加突现了社会存在的人化特性。

## 3、人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社会历史领域，我们仍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基本问题，但在人与主体世界以及人与客体世界的关系比较中，前者必须处于主导地位。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人们必须牢牢把握人社会化的目的，发挥群策群力的优势，增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能否做到同心同德是个关键问题。但遗憾的是，做到这一点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它同样需要认识、经验和技巧。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离心离德、欺诈蛮横、征战杀戮之事司空见惯，其间教训令人痛心疾首。这种旨在向他人索取的行为虽然常使掠夺者获益匪浅，但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并不能增加总的社会产出，而且在争战过程常常要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牺牲几代人文明的成果。由此也说明必须把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首要问题，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研究，制定出严谨慎密的方案和对策。

人与主体世界的关系处于主导地位，人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并且前者现实状态的优劣直接决定后者的现实存在和发展状态。这是我们应有的“思维”。

一切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意志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尽管社会关系表现纷纭复杂，性质善恶有之，但善恶的标准始终如一，不以物质环境条件的差别为转移。无论生产力水平如何，专制和剥削都不是进步；无论生产力水平如何，消灭差别、取消法律、实现完全大同也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衡量社会关系先进与否的标准在于人类认识的结果，制定标准的途径在于人的认识机制内部，与社会存在没有任何关系。

马克思主义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在历史中的地位，不知道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与方法，在历史观上仍机械地照搬他那本来就残缺不全的物质——意识关系论，并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归结为纯粹的物质利益矛盾，而且认为这一矛盾绝对受物质利益的左右，是不可调和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消灭对方，进行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 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是马克思最著名的观点之一，他并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得出社会形态不断更替变化、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实际能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力量，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它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它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and 交换关系；第三，产品关系以及由它直接决定的消费关系。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认为，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生产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如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在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下，人们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平等关系；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下，人们之间是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

### 1、生产关系的实质

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经济模式。我们已经指出，唯一科学可行的经济模式就是自然经济模式，它与生产力水平没有任何关系，具有超稳定性。对此，我们用不着作更多的分析。

剥削和压迫与所有制类型没有任何联系，或者说剥削和压迫从来不是来自经济领域，而是来自政治领域，而且这种剥削和压迫在公有制制度下比在私有制制度下更甚。

私有制一直与人性相适应，但私有制本身既不是罪恶，也不是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灵丹妙药。自然经济模式下的生产关系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是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而平等自由的政治气氛是超越生产关系本身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因素。

### 2、错误的生产关系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根据生产关系的类型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它认为社会形态的“进步”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发生变化的结果。实际上，所谓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感觉。

原始社会的人们，还没有充分社会化，人们的活动一般局限在一个部族内部。一个部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内部实行“共产主义”是可以想见的。但这种部族共产主义与家庭产生后的家庭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若把它们称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实在有点贻笑大方。从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看，不仅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且部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斗还异常激烈。对于处在初始文明阶段的人们，想象得他们离作为动物的本性太远是不客观的。

奴隶社会不是人类社会典型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平等自由”观念没有建立起来的社会阶段，被剥夺了“平等自由”权利的人们都已沦为了奴隶，并且奴隶的处境一直没有得到改善。鲁迅先生曾是这样评价国人的政治地位的：“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他又说：“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制造奴隶的根源既有内部压迫也有外族侵略，还有因自己所犯的罪恶而受到的惩罚。奴隶的存在，无论如何不是社会进步的象征。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奴隶社会的出现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相对于原始社会的一次社会进步。简直是一派胡言。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生产的内容和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但生产关系的本质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它们都是私有制，都有贫者和富者，也都有“无产者”给有产者打工的现象，都采用生产关系的自然经济模式。从农业社会转化到工业社会，这的确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但认为生产关系也同时前进了一步，这是没有根据的，属于只看到现象，没抓住本质。马克思曾对所谓无产阶级的出现欣喜欲狂，认为一批有觉悟有前途的人获得了自由，是历史的必然和生产关系进步的表现。其实不然。欧洲出现大批无产者，是因为那时发生了罪恶的“羊吃人”事件，无产者不是因此获得了自由，而是他们被强权剥夺了选择农耕的自由。无产者的极端贫困是专横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工业作为一个极富有创造力的产业，它出现只会增加人们的择业机会，提高人们的比较收益，从而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正如我们今天大力发展各类产业的动机如出一辙，我们又怎能诅咒什么资本的罪恶呢？

既然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考察都站不住脚，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发出的梦呓呢？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构画根本行不通，因此，社会主义的实践必将以失败告终也就是人们意料中的事了。

## 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是同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及设施。

我们认为，以自然经济模式为内容的生产关系具有稳定性和回归性，因此，恰当的经济基础模式也是单一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的认识不断发展的只有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属于人与客体世界关系的范畴，上层建筑属于人与主体世界关系的范畴。按照我们的观点，人与主体世界关系状态的优劣决定着人与客体世界的关系的优劣，因此，上层建筑模式的优劣实际上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状态的优劣。

适合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上层建筑不是一下子建立起来的，它需要人们反复认识和反复实践，并不断修正和完善。保证上层建筑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由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学说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先进的上层建筑同先进的生产力一样具有普遍性。那种上层建筑“特色论”“国情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是骗人者无谓的托辞而已。

尊重权利、保护权利、实行自由平等是自然经济模式发挥作用的前提，也必然是上层建筑正常运作的宗旨，它与民主制度一起构成上层建筑的灵魂。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斗争哲学，因此，它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看法都是斗争性的，是迎合斗争和专政的需要的。除了斗争之外，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平等和民主。这也警示我们只有摒弃反动的阶级斗争观念，才能对上层建筑作出全新的本质性认识。

## 八、阶级、国家、革命

阶级、国家、革命与剥削的概念相联系，是马克思主义鼓吹斗争的号角，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精魂。

### 1、阶级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反复使用的一个概念，并贯穿他们全部著作的始终。什么叫阶级？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事实上，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并不必然导致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并不必然形成经济剥削。由于根本不存在什么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集团，因此也就不存在经济关系上泾渭分明的阶级。实际上，在任何社会，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布总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绝不是以“有”和“无”两种状态截然分开的，而是基本上呈正态分布状态。在这种分布中，拥有财富量占社会平均水平的人口居多，处在两极的居少。因此以“有”和“无”两种状态划分社会集团，实际上是把绝大多数人排斥在被考察的对象之外，从而使得这样的考察变得毫无意义。另外，无论社会成员的经济状态如何，他们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开展全方位的经济交往，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某一个经济关系中处于对方的地位。因此，人们在经济往来中有可能形成共识，达成默契，并按照互利的原则进行交往。正如在买卖关系中，我们既不能说买者剥削了

卖者，也不能说卖者剥削了买者。同样，在劳资关系中，我们既不能说资本家养活了工人，也不能说工人养活资本家，他们本来就是互惠互利、各得其所的关系。

尽管如此，在人类社会，剥削和阶级的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主要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形成的，而是由于政治上不完善的结果。

“剥削”，的确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占有”。这种占有，实为强占。所谓剥削，就是具有不良意识的人，依据自身力量上的强大，以暴力相威胁或采取暴力措施征服他人，践踏公平、自由的原则，践踏公理和法律，强行攫取他人经济利益的行为。显然，财富是“剥削”的客体而非主体。尽管财富可诱使人去强取豪夺，杀人越货，但我们仍不必诅咒什么“资本从出生那天起，就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等等。

产生剥削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权丧失了它的基本功能——保护、发展公平自由的政治环境。剥削的根源有两种：第一，豪强恶势的剥削。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土匪恶霸必然盛行，他们存在的目的总是掠夺。第二，官僚强权的剥削，直至强权者以国家的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对广大人民实行权利剥削。而前者的存在恰恰以后者的存在为环境条件。在一个社会中最经常存在的阶级矛盾就是平民阶级与官僚阶级的矛盾。

剥削者通过掠夺，不仅使他们拥有了财富，反过来又改善了他们掠夺他人的手段，扩大了掠夺者的队伍，同时也加深了他们与人民大众的对立。由于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是单向的、强制性的，不是平等的、交互的，因此，这种对立才真的是不可调和的。

在一个存在剥削的社会中，被剥削的不一定是穷人，搞剥削的也不一定是富豪。掠夺者中不乏流氓无赖式的穷鬼，被掠夺者中首当其冲的是富豪。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如此。

关于贫富的成因，说来比较明显。导致贫穷的原因有：一、懒惰或无能，二、被他人掠夺。与此相应，致富的情况也有：一、勤俭有为，二、掠夺他人。如果把贫富的原因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归结于他人而不考虑自身的因素，那是为实施掠夺寻找借口。

针对贫富的两种成因，我们不难理解：由于人的品质不同，能力各异，贫富差别永远不可能消灭；我们所要消灭的对象是强力掠夺和强权剥削。

马克思主义者不计贫富之成因，一律视财富为罪恶。特别是在中共建国之初，只要谁有财富，谁就同时拥有了罪恶，其财富或者被没收，或者被改造，财富所有人或者被镇压，或者被管制。整个国家公然成了强取豪夺的疯子。

## 2、国家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独占的暴力工具，它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组成。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犹如狂人的呓语，几乎与任何一个思维正常人的理念相去甚远。它显然是想以令人不知所云的怪论达到混淆视听、喧哗取宠的目的。

我们认为，国家是人们以相同的观念、相同的理性为纽带而结成的具有统一人格的一种范围最广泛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全体国民。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这个组织太大，人口太多，而且人的流动性强，以及因生老病死所引起的成员不断更替，国家概念中人的因素反被忽视。同时由于国家的领土范围比较稳定，国家的变化也常以领土的变化为突出特征，因此，领土成了国家概念的关键词。但这是非本质的。实际上，国民永远都是构成国家的主体，领土是国家这个组织的活动场所，当然也是这个组织最重要的财产。因为人的生存必须以一定的空间环境为必要条件，它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源泉。离开了生存空间，人就不能生存；生存空间越大，人们的生存条件就越优裕和有保障。这也是国家之间常为领土而激烈争战的原因所在。

国家建立之后，当然离不开国家政权以及行使国家政权的国家机关。但在以往的国家观念中，由于错误地理解国家的本质和国家政权的渊源，使得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专制倾向十分严重和普遍。专制导致政治的异化，使统治者堕落成剥削阶级，广大人民群众成为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自觉不自觉地代表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会是象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代表什么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中确实不乏大地主大资本家，但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他们对人民实施权力剥削的结果，剥削的对象除了穷苦的百姓，更有手中有钱的富豪。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专制的国家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并不是当然的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通过盘剥和掠夺当然地加入了地主阶级或资本家阶级的队伍。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专制制度源远流长，但专制的国家形态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进步而进步，它仍是国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状态，这也使国家的形象一直带有几分恐怖色彩。只有随着专制制度的铲除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国家保护平等、保护自由的职能才能得到有效体现。国家作为保护平等和自由的必要组织形式，它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国家的军队、法庭和监狱也将永远存在下去。

### 3、革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它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其实，这种革命观符合一切专制主义者的思维逻辑，他们所谓的革命，其目的是攫取国家政权。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家政权是可以抢来的，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谁取得了国家政权，谁就取得了实施专制的特权，谁就可以以天下奉一人，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



专制对当权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也造成了革命具有反复性。从这点上讲，也可以说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更是毫不例外地是用血与火写就的。

通常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从夏启开始的。夏启之前，尧、舜、禹之间实行的是帝位“禅让制”。由于“禅让”重德，故与德政背道而驰的专制应是不可能存在的。禹也指定了继承人伯益。禹死后，禹子启杀死了伯益，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夏王朝，从此开始了“家天下”，也从而固化了一个社会阶层，使中国社会开始分化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史。

由于统治者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扩大自己的权利，逃避自己的义务，并将它们转嫁到平民阶级头上，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这两个阶级的对立。由于掠夺是一切专制者的天性，反掠夺也就成了广大人民的天性。

专制发展的最初表现是腐败。越到后来，统治者的掠夺愈加疯狂，人民的生活极度艰难，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已破灭；而统治者愈加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玩物丧志，财政入不敷出，国家机构丧失组织性和战斗力，国家政权开始摇摇欲坠。这时候，一场大的社会革命就会接踵而至，旧的专制政权在革命风暴中灰飞烟灭了。

新的政权建立之初，由于新的当权者来自民间，他们往往还能体察民情，认识专制的反动性，还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开国之君往往比较开明，能闻过而喜，从谏如流，全国也在清贫中呈现出一派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但当天下既定，硝烟已远，统治者便开始陶醉在成功的旋涡里，以天之骄子、万民父母自居，放心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权威，丧失了原有的自觉性和警惕，最终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以至最后又被推翻。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此反复不已，似乎进入了一种不可逃脱的朝代、政权更迭的循环圈。

专制者牺牲了人民，最终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有多少亡国之君发出了“永世无生帝王家”的悲叹。可惜的是，无论是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都没有找到悲剧的根源，革命偏离了它应去的方向，使革命成为以一个专制代替另一个专制的跳板。但只要是专制，不论其是否改头换面，最后仍要被推翻。消灭悲剧的根本途径只有消灭专制，消灭帝王，实行民主，实行共和。

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社会矛盾都客观存在，而且形态多样。官民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决定着社会其他矛盾能否顺利解决。但不管是怎样的社会矛盾，我们都主张尽量通过“政治途径”予以解决，而应尽量避免社会革命。因为革命特别是社会革命总是残酷的，它不仅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同时还伴随着无数的人头落地，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被动调整。

尽管如此，实现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社会革命往往不可避免。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我们希望一切当权者都应当警觉，

不要执迷不悟，不要坚持专制，以免使自己成为革命的对象，成为这盛大节日的祭品。新的革命者也一定要牢记革命的目的，即打倒强权，打倒专制，还政于民。这样的革命才是最积极、最彻底的革命，这样的革命者才是最具有远见卓识和最富有革命精神的人。其中，最值得人们尊敬的革命者就是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

真正的革命者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国家政权不是抢来的，它的基础是人民主权，是人民根据社会契约将个人权利的一部分转让、认同而形成的一种确定的、统一的权利。而且国家政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与一定的义务相联系。国家政权的行使者必须承担起保护人民主权，保护民主政体，保护平等，保护自由的职责和接受人民监督的义务。

只有具有真正的革命意识，才能进行真正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真正成功。

## 九、论人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认识，其特点是从根本上否认人的物质性和生物性。它认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现实品格，归根到底是由他特有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一切社会环境中，生产方式对人的内在品格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决定意义；人们只有在对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才确证和发展了自己的现实本质。

勿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是其“物质神秘主义综合症”的继续发作。它不仅否认了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而且继续无视人是物质和意识的有机统一体这一事实，把人看成了受物质决定的物质附属物，并在物质面前表现出十足的悲观主义。

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错误，导致它对人性的理解严重偏失。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人性，指的是一切个人在其生活活动中所表现的属于人类特有的种种共同属性和特性的总和。它认为，人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或丰富自身的具体内容。在社会发展的阶级分化时期，它又是和阶级性相统一的。然后，马克思主义再运用它的一系列理论，进而由此推导出资产阶级必然是邪恶的化身、无产阶级必然是良知的代表的结论。与资产阶级的贪婪、自私相反，无产阶级天生乐于奉献、无私无欲，并以劳动作为自己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人性发展到光辉的顶点。

我们认为，从善恶两个方面对人性进行考察的方法是正确的，但认为善与恶的属性会泾渭分明地体现在两组不同的人身上，是十足的形而上学的谬论。在我们看来，人性是善与恶的综合，是理性和欲性的统一。

人性首先表现为动物性的欲性。人生离不开对在世界的需求，而且由于人的意识是丰富的，感觉是敏锐的，人的需求也是无限多样的，而人们的需求对象却往往是稀缺的。除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交换外，人们一般只能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自己对稀缺资源的原始占有：一是通过改造自然，二是通过索取他人。前

者表现出欲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后者表现出欲性是万恶之源。如何弃恶从善，理性便是慈航。

没有理性不成其为人，没有欲性同样也不是人。欲性第一性，理性第二性，欲性具有两面性。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但否认人的欲性，认为他们无求无欲，乐善好施，无异于把人推入了神的境界。但适用于由神结成的社会的规则，显然是无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 1943 年出版的《激励理论》一书中提出，人的需求具有层次性，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分别是：一、生理需求，二、安全需求，三、社交需求，四、尊重需求，五、自我实现需求。一般是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递次进入较高层次的需求。随着人的需求层次的逐步提高，也将越来越多地渗入了人理性的成分。

我们不能否定人的欲性，因为一个无求无欲的人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不可能有任何所作所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欲性，因为我们必须关注欲性所带来的侵略性和破坏性。我们只有正视它，才有可能认识它，以抑其恶扬其善。不承认它，甚至有意回避这一问题的存在，恰会让坏人钻了空子，使好人受到打击。

相比之下，西方先贤对人性的把握就十分准确。卢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由此出发，卢梭发现，“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从而将人性与权利、平等、正义等概念恰当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认为，人性是发展的，但也不会发展到纯理性，欲性恶的一面始终会存在，有时还会疯狂发作，仅在五六十年前，日、德、意法西斯主义就制造下了人性劣于兽性的骇人记录，我们又怎能相信将来能完全杜绝某些人兽性的复归呢？！

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确实曾经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正如历史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那样，他们理应具有反抗和变革精神，但我们无法相信他们具有完美的人性，即使有个别人的品德确实十分高尚，但至少由于能力上原因，其完美的人格也难以终其一生，更无法相信他们完美的人性会代代相传。再看看我国的情况，如果说我们还可以相信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人格还比较高尚的话，且看他们的子孙，他们身居高位，腰缠万贯，人性的灵光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结党营私，垄断党政各重要部门的大权，大肆敛财敛色，成为中国最穷奢极欲的阶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谎言，成为现代专制者以光辉人性欺骗人民的绝好籍口。

###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无非是继续强调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并妄想最终实行按需分配，实现共产主义。

由于马克思对世界、对人性和对历史的考察全面错误，决定了他所构划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只能是狂想者的思想怪物而已。

### 一、“暴力革命”破坏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进程

我们并不完全反对暴力革命，特别是受压迫的人民对专制者实行暴力革命是不用商量的，这是铲除专制、实现民主的必经途径。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暴力革命，没有弄清革命的根源，没有找准革命的对象，没有把正革命的方向。马克思妄图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一个根本不应该属于人类的社会，从而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不亚于法西斯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荼毒。

###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旧专制的翻版

由于马克思主义既没有认识到专制的弊害，也没有把握住人性的特点，决定了它所构想的所谓新型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旧专制的俗套。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没有认识到当年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已经不再是什么“无产阶级”了，而是上升为广据天下的官僚阶级。他们完全可能象旧官僚阶级一样，对广大人民实施剥削压迫，从而不断制造新的“无产阶级”。标榜以消灭剥削阶级为己任的阶级，一旦自己成为剥削阶级，消灭剥削又成为掩饰他们实施剥削的面具。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剥削，实质上是借以否认剥削的存在，达到麻痹人民斗志的目的。

### 三、公有制有悖于它所宣称的理想

公有制不仅没有什么优越性，其实施的结果恰恰会背离它那诱人的设想。1、公有制的内容空虚，其实施结果将导致在全民大公的幌子下使少数人得以肆无忌惮地营造大私；2、在公有制下劳动者不仅不能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反而使之紧密依附于企业，以至否定了他们的就业选择权和社会地位；3、由于产权不明，公有制企业的积累和改造机制不健全，生产经营效率低下；4、公有制没有自然生长点，在实际运行中它是一种没有支点的产权形式。

### 四、计划经济是幼稚的幻想

计划经济的设想显然发端于马克思那简单得可怜的描述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模型。它认为只要克服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按照它建立的经济模型组织生产和消费，就能解决经济危机等诸多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

这是十分可笑的幼稚。

首先，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决不是两个简单的方程所能描述的；其次，生产必须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指导而安排，而不能按照政府的想当然随意进行；第三，任何先进的手段都不可能及时准确地捕获消费者千差万别的需求信息，并及时作出处理，发出指令，同时也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得到其他生产者的信息；第四、更为严重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解决个人的责任和动力问题。可

以设想，个体的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如果完全被与己无关的力量所控制安排，其结果必将导致个人责任心的丧失和个性的泯灭。因此，计划经济不仅不能克服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等经济痼疾，而且其病症更为沉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当权者不仅没有象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反而任意排斥价值规律的作用，做出了许多自欺欺人、贻笑大方的蠢事。

当然，计划经济的尝试已遭到彻底的失败，中共最终抛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注脚。

## 五、“按劳分配”善恶掺半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强调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取得物资分配权，而不能凭资本而取得。这是错误的。劳动和资本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对劳动和资本的回报率也必须符合有关的经济规律。否定资本的分配权，就是否定资本的收益权，也就否定了财产所有权，进而也就否定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就意味着你的东西我可以毫无代价地当然地使用，从而破坏了一切理与法的基础和依据。

二是说明按劳动成果的大小支付报酬。这是正确的。经济活动的结果，首先从宏观角度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初次均衡分配，然后再分别在劳动和资本内部分别进行均衡分配。资本内部的分配，表现为按照资本的多少分享企业的投资收益和分担投资风险。劳动内部的分配，表现为按照劳动贡献大小分配企业的工资总额。这种均衡是在企业和社会两个领域交互进行的，而不是仅仅表现在某一个方面。在这个均衡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价值这一概念，而是价格，它反映了该资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稀缺程度。而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的价值概念由于没有可操作性，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学意义。

在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中，按劳分配制度以宪法作保证。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恰恰实行的是它那错误的一面，而对它正确的一面却一日也没有实行过。在针对劳动实行的分配制度上，从来就不是什么按劳分配，而是按身份按地位按等级按资历的“按位分配”。

## 六、共产主义是海市蜃楼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们给人们描绘的人间天堂。它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觉悟极大提高，社会物质极度丰富，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那时的社会，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阶级，没有差别。

无疑，高度发展的人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但由于人性的发展具有局限性，决定了共产主义必然永远是痴人的幻想。我们相信，除了少数继续坚持愚弄人民的当权者仍在自欺欺人外，没有人还会相信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鬼话。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反自然、反人类、反社会、反民主、反科学的精神垃圾。马克思本人既算不上经济学家，也算不上哲学家，更算不上政治家，而是一个十足的偏执狂。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历史的误会，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是历史的必然。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专制政治

尽管马克思主义全面错误，但它的理论却长期被一伙人奉为至宝，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在传统的专制理论被推翻后，它成了更完善、更系统、更伪善、更具有欺骗性的专制理论。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专制理论

中国的政治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专制史，自夏开始数千年中，几乎从未闪烁过民主的光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过早地形成了一部系统的专制理论，并使之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牢牢占据统治地位。其中最典型的专制理论莫过于“天子论”和“君子论”。

#### 一、天子论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君主制，皇帝就是国家，就是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们当然不承认“人民主权”论，而是谎称“君权神授”，所谓“王者父天母地，为天子也”，把皇帝称为“真龙天子”，把皇帝的权力说成是“天意之所予”，皇帝就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代表上帝来统治人民的。与此相联系，忠君成为君主时代道德的最高原则，所谓“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谁敢冒犯皇帝的权威，谁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谁就将被以天的名义予以严厉惩罚。特别是它与宗教思想相结合，来进一步巩固人们头脑中的“天子”观念，并对“善”以“天堂”相诱惑，对“恶”以“地狱”相威胁，教化人们服从君权。

#### 二、君子论

“天子论”仅仅树立了皇帝的权威，但怎样规范万民的行为，使之服从这个权威，在这一点上，“天子论”是不完备的，于是又产生了“君子论”，孔子就是君子论的积极倡导者，《论语》就是君子论的经典著作。

胡守钧先生在其《君子国的悲剧》一文对君子论作了十分淋漓尽致的批判。

他指出，君子一词，孔夫子常用。不仅孔子自称君子，弟子们也视他为君子。而且，君子是一切美德智慧的化身。君子，既是孔子借以劝喻帝王将相的榜样，又是培养门生的楷模，并且还是教化全社会的圭臬。君子治世，四海同乐，天下太平，便是孔子的理想社会，可名之曰：“君子国”。

君子国的结构：贵贱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子国的精神：仁道。

何谓仁？孔子说：“爱人”。

仁的行为规范是礼。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非礼勿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

所谓仁，也就是贵贱有序社会结构中的爱人。只是由于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不同，而选择不同的爱人方式：君要“为政以德”，“使臣以礼”；臣应“事君以忠”，“敬其事而后其食”，甚至“事君能致其身”；官爱民，做到“尊五美”、“屏四恶”；民则应顺乎仁道，做到“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

### 三、“君子论”是进化了的专制理论

“天子论”虽然把君权神威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缺少证据，并且早在陈胜吴广起义时就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而“君子论”却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专制政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直到近代人们才发现了它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可见其功力非同一般。

鲁迅先生最早揭露“君子论”的真面目。他在《狂人日记》中写道：“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那么，君子论怎么会转化成吃人的专制理论的呢？胡守钧先生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他说，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一面吃人一面讲礼教，显然是有深刻原因的。

#### （一）借礼教证明独裁有理

独裁政治的要义是一股力量独断权力、强调等级、反对平等。贵贱有序，无疑是独裁政制的护法。尽管孔子也讲仁者爱人，但没有什么力量能确保君王爱人，于是君王们理所当然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解释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孔子的礼，成为专制制度的灵魂。独裁合理，吃人有理。

孔子是重家庭重国家的，认为个体的利益应从属于群体的利益。在家而言，家庭利益高于一切，是为家庭本位论。在国而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为国家本位论，家庭的利益又从属于国家利益。如果国家能体现民众的根本利益，国家本位论当然尽善尽美。

但是，国家必须以一个权力系统进行管理，并且代表它。君主制中，君主行使最高权力，代表国家。在没有制衡力量的条件下，国家本位便自然而然地变为君

主本位。朕即国家，此乃帝王的国家哲学之通义。所谓忠君爱国，不是君在前国在后吗？当然帝王要吃人时又常扛出国的牌子，当做冠冕堂皇的借口。国不是大家的吗？于是乎，中国历史上许多冒犯了君王的人，就冤死在叛国卖国的罪名之下。

## （二）谈礼教以自我标榜

即使吃人者再愚蠢，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然承认吃人的，于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论便成为他们美丽的装饰。吃人者大谈礼教，标榜自己如何仁，如何爱人。中国历史上有哪个吃人的帝王承认自己是暴君的？他们不都是自诩为仁君，爱民如子吗？

## （三）推行礼教，令百姓甘心被吃

以君子自居而又不愿遵循君子之道的帝王们，却十分积极地以君子人格向民众示教，因为受君子人格感化的芸芸众生易于统治。

（1）君子安分守己，承认贵贱有序乃天经地义，安守固有等级。

（2）君子寡欲，安贫乐道。国家的财富总是有限的，常出现物质短缺的矛盾。倘若民众能象君子那样清心寡欲，而又能奉献玉食，帝王其不是其乐无穷吗？要求民众寡欲，帝王自己却穷奢极欲，仿佛矛盾，其实统于一理：帝王的纵欲正是以小民的寡欲为前提的。

（3）君子乐于尽义务，而不计较个人的权利。《论语》中凡提到君子的地方，尽讲君子如何爱人，如何守礼，如何忠，如何恕等等，而从不谈君子应有何种个人的权利。君子重义务的思想贯穿整部《论语》。

依统治者看来，如果百姓们象君子那样乐于尽义务，而从不争自己的权利，那是极利于巩固统治的。百姓们只有奉献一切的义务，而没有做人的权利，帝王们则权利恶性膨胀，而不承担义务。百姓不肯奉献，使用权力机器压迫之；谁如果胆敢反对帝王的无边权利，就会遭到血腥镇压。义务和权利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分离：权利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而义务则与权力的大小成反比。于是君子国中人便常患人格分离症：对于权力大于己者只能尽义务（不管愿意与否），而对于隶属于己者则尽量发挥自己的权利。

因此，尽管《论语》描绘出一派人人互爱的理想景象——这正是孔子的魅力所在，但因为缺乏可操作性，根本无法实现，始终是海市蜃楼。君子国的结构——贵贱有序权力独断，则是历代独裁者的有效武器，成为吞噬人肉的机器，而且挂着人人互爱的旗帜。

## 三、独裁政制的特征及基本表现

君主制是独裁政制。不唯如此，凡是以一股政治力量垄断国家政权的政治形态，不管名称怎样，皆是独裁政制。在这种政体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



权者滥用权力的现象必生无疑。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滥用权力，便导致吃人的悲剧。

（1）为了满足私欲，独裁者横征暴敛，收刮民脂民膏，敲骨吸髓，哪个王朝不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2）为了巩固统治地位，独裁者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派，屠杀批评者。历代王朝皆是靠压迫、屠杀造成恐怖，进而靠恐怖来维持政权。

（3）独裁者“口含天宪”，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独断一切。任何荒谬的指令必须贯彻执行。帝王乱杀无辜，青史中随处可见。

（4）“加之，由于法律只是君主的意志，君主只能按照他懂的东西表示他的意志，结果，便需要有无数的人替君主表示意志，并且同君主一样地表示意志。”因此，形形色色的官吏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成为一个个土皇帝。对上，他们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对下，则气使颐指，飞扬跋扈。官吏成为君主意志的牺牲品，反过来，他们的意志又会去牺牲民众。历史上的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 四、君子论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影响

君子的对立面是小人。君子和小人是人性善与恶的通俗称谓。如何抑恶向善，抑小人扬君子，是塑造国民素质，增强团队精神，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关键。二千年来，孔夫子的君子理论从来没多造就一个君子，却成全了大大小小的无数的小人。它不仅表现在历史上没有几个仁君贤帝，而且还表现在民间交往中的小人叠起。特别表现在国人的生意合作过程中，一开始人人都以君子自居，羞于言“小人”之道，避而不谈成如何分利，败如何担责。但当成败既定，便在分利或担责方面纠纷蜂起，完全摘去了君子的假面具，君子完全蜕变成为小人。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先君子后小人”的交往模式，它严重伤害了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团结和协作精神，造成人们在合作中有始无终，虎头蛇尾，事业无论成败都难以为继。反观西方“先小人后君子”的合作模式，方知那是真的科学。以防小人而树君子，而非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这是我们在设计我们的行为规则时应有的理念。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现代专制主义的理论工具

随着民主思想的浸润和君主体制的崩溃，孔子思想受到声讨，君子论作为专制的理论工具已经成为过街之鼠。这时，民主政体本该应运而生，但专制制度的灵魂不死，不断诱惑形形色色的人物大搞复辟，继续为争夺国家政权而连年征战。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毛泽东出现了。毛泽东，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神话般的死中求生的本领，带领中共军队打败了蒋介石，统一了大中国。但毛泽东终于没有成为“华盛顿”，而成为帝制推翻后的又一个“皇帝”——尽管他本人十分开明。当然，中共上台以后，其实行的已不是以往的那种君主制了，但却是堪称为比君主制更糟糕的党主制，马克思主义也正式成为中共党主制的理论工具。

## 一、马克思主义集各种专制思想之大成

专制的敌人就是民主，民主的光辉足以照透专制者一切华丽的外衣，直逼其丑陋的肌肤。而现代专制理论必须做到既要排斥民主又要披上高度民主的外衣，真是够勉为其难的，但马克思主义却能轻而易举地胜任了这一既能当婊子又能立牌坊的“光荣”角色。

### 1、马克思主义既营造了天堂，又创造了地狱

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剥削的分析，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为恐怖可憎的人间地狱，把他虚构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描绘成令人神往的人间天堂，通过恐吓和诱惑两种手段，使人们相信它的谎言。

### 2、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救世主是无产阶级

它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是，这个救世主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虚无缥缈的神，而是现实世界中的某些人，这群人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极尽溢美之辞，力证他们的各种优秀品质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大公无私，乐于奉献，除了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外，没有其他任何私利。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无异于超凡入胜的神。这就为一些人以救世主自居而奴役他人制造了理论根据，这也决定了它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宗教邪说都来得凶恶可怕。

### 3、它改良了专制组织

马克思主义提出建立共产党的主张，从而使君主个人专制发展为党主集体专制，极大地加强了专制功能。但它却极力鼓吹共产党是“先锋队”，是优中之优。到了中共那里，就更是“伟大、光荣、正确”了。

### 4、它重新划分了社会等级

它不顾平等社会要求根本打破社会等级制度的通例，坚持给社会人等都打上了“身份”的烙印。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人拥有了一切，被摆到了最优越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仅拥有政治领导权，也拥有经济决定权。农民是他们团结的力量，但条件是服从他们的领导。同时农民中又至少分了五六类，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小业主、富农是接受他们改造的对象，地主、资本家是被他们专政的对象。在中国现阶段，全国人口除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别外，在非农业人口中又分为干部和工人两大类，只有拥有干部身份的人才拥有在中共党政机关担任职务的资格，而工人没有，除非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另外，工人中又要分为固定工、合同工（包括全民合同制、集体合同制、农民合同制）和临时工（包括计划内临时工和计划外临时工）等。各色人等机会待遇各不相同。

### 5、大搞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专制理论的根本区别，也是“进化”的根本特征。这种理论使得专制者不仅会讲仁爱，而且还公然拿起了刀，对一切叛经离道者明目张

胆地进行迫害和杀戮。所谓“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实际成为他们对广大人民实行专政的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 6、以“剥夺剥夺者”为名，大肆进行进行财富掠夺

由于马克思主义认定地主资本家的财产都是靠剥削得来的，是不义之财，从而为他们掠夺这笔财富找到了非常美妙的借口。正是通过这种掠夺，专制者迅速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 二、中共在中国的专制表演

中共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决定了它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专制的群体。

### 1、旧帮会式的组织结构

中共虽然在名义上是一个现代政党，但在组织上竟与旧帮会无异，直至今天中共成为执政党四十多年后依然如此。

(1) 入党必须有介绍人，还要煞有介事地面对党旗宣誓，承诺拥护其纲领，遵守其章程，执行其决定，严守其纪律，保守其秘密，对其忠诚，随时准备为它牺牲一切，永不背叛。就差没有喝血酒。

(2) 实行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是，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 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服从”，其落脚点是“集中”，再配合“级别”上的泾渭分明，实际上就确立了少数党魁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反过来，党就 成为了少数人的党，成为他们独裁专制的御用工具。

以上两条也恰恰正是中共党章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党章中其他一切内容都是可有可无的，都是随少数党魁的意志而可任意增删的。虽然 中共也在形式上采用了具有民主色彩的“会议制”和“选举制”，但每次都不过是一场闹剧。在党员们“服从”的承诺下，党魁们的任何意志都是理所当然地能够顺利通过的。

### 2、对外残暴

中共对人民的残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靠掠夺起家。一切帮会都是要掠夺的，尽管有时会盗用“杀富济贫”名义。中共当然也不例外。它以消灭剥削为借口，干起了杀人越 货的勾当，大张旗鼓地进行掠夺。为掠夺而战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尤其是在中共建立武装之初，它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这种掠夺与“杀富济贫”如出一辙，同样 是以牺牲一部分人来赢得另一部分人，但其中的高明与拙劣之别就在于你究竟使哪部分人保持了多数。中共是高明的，他们知道以牺牲少数而赢得了多数的诀窍，“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他们当年的口号，大部分人正是因为尝到了掠夺的甜头而加入到中

共的行列中去的。因此便有了不少人在组织上加入了共党，但到死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怪事。这在中共高级将领中不乏其例，许世友就是其中之一。

(2) 靠暴力成功。中共牢固坚持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终于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共的成功，只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战无不胜的证明，而不可牵强地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真理的证明。但中共打下天下后，便以偏概全地以军事上的胜利作为其品质全面优秀的证据，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他们实施专制的“圣经”。他们继续延习中国几千年的“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帝王逻辑，牢牢霸占执政党的地位不放松。

(3) 靠迷信愚弄。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要别人认同其专制的迷魂散，不准人们对它有丝毫怀疑。中共自己也以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执行者自居，要人们保持对它的绝对信任和虔诚，从而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以此来摆脱人民的监督。

(4) 靠友爱迷乱。“毛主席爱人民”“共产党象太阳”，人民要“五讲四美三热爱”，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他们教人民喊“党啊！亲爱的妈妈”，完全颠倒了母与子的关系，达到了乱伦的程度。

(5) 靠户籍布控。在世界上唯有的三个实行人口户籍管理的国家中，中国便是其中之一。户籍制有力地配合了“阶级等级”制度，再加上各种严格的审查审批制度，足以使一切人的行动置于党的严密监督控制之下，犹如布下了天罗地网。

(6) 靠禁言息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也是专制制度的大敌，任何专制都对它忍无可忍，中共更是不会例外。一切宣传工具都只能是党的喉舌，任何其他声音都会被宣布为非法，立即遭到查禁，于是新闻面上总是一派生平气象，人民的怨声只能流传于街头巷尾。

(7) 靠欺骗蒙蔽。中共总是报喜不报忧，善于把亏损说成盈利，把腐败说成清明，把专制说成民主，而且是“最广泛、最全面、最真实、最具有开放性的民主”。

(8) 靠武力维持。中共不顾现代国家“军队国有化”的通例，继续牢牢控制军队，作为它维护专制的暴力工具，并以此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极力制造恐怖空气。中共的出现，是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幸，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使多少人成为冤死之鬼。六四事件中，中共又写下了新的罪恶记录，犯下了新的骇人暴行。

### 3、对内倾轧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不仅适用于中共外部，同样也适用于中共内部。谁要想成为党的头面人物，谁就必须控制对军队的领导权。由于中共抱定权力是可以抢来的，于是中共内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抢夺权力的明争暗斗，上演了一幕幕“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活剧。

中共执政前的历史不必再说。建国后，首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毛泽东当然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打败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猖狂进攻，刘也被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悲惨而死，成为毛专

制的第一个牺牲品。第二个是林彪。他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时，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动议（当然是他自己想当），遭到毛的拒绝，并在毛的操纵下，通过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决议。林在阴谋不成时耍起了阴谋，毛也险些为此付出代价。但林也失败了，只落得折戟沉沙空遗恨。第三是“四人帮”。毛到了晚年，中共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达到白热化，两大阵营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进行反攻和自卫。毛逝世后，斗争立刻公开化，并在毛尸骨未寒之时，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以快制慢，先发制人，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帮”，后四人皆悲惨而死。第四是华国锋。华国锋上台时，邓小平已被毛泽东赶下台。毛死后，邓小平蠢蠢欲动。他在华国锋应允其复出后，绝不甘于寂寞，一门心思瞄准最高领导权。他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最具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付华的“两个凡是”的教条，并趁华出访之机布下阵容，发动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对华发难，逼华就范，将华拉下马，并在以后的粉碎“四人帮”的有功人员名单中，公然删去他的名字，而将其隐在“叶剑英等人”的“等”字中。邓遵守他复出时对华许下的不谋取主席职位的诺言，而将他当年的追随者胡耀邦推上党的最高宝座，他自己却坚持成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并藉此进行幕后操纵，实行垂帘听政。邓改党“主席”之称谓而为“总书记”，以便使后人根据他在党内较早担任过总书记职务的事实，错以为他早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恰当地回复了国歌的歌词，以表示他决心不再“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他欲展开批毛，但遭到人民的普遍抵制。因为毛虽专制，但他有着强烈的同情人民、热爱人民、克己为民的朴素感情。第五是胡耀邦。胡耀邦担任了一个很窝囊的角色，注定他必然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邓小平是一个有着十足小人气的中国人。他在中共多次权力角逐中数起数落，应当最知专制之弊。但他上台之后，就立刻遂了小人之志，继续坚持专制，与人民在长期禁锢之后要求实行民主的意愿背道而驰。胡再也不能容忍邓小平的飞扬跋扈，遂义无反顾地支持了1986年的学生运动。他因此被迫辞职，并于1989年悲愤而死。第六是赵紫阳。赵也是邓当年的追随者，胡辞职后的继任人。随着专制所造成的政治迫害逐渐降温，接踵而至的经济掠夺日渐疯狂，政治腐败日趋严重，人民怨声愈来愈高。赵作为当年的受害者，也认识到腐败的根源所在，并积极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到了1989年，学生运动再次爆发，并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积极响应，赵紫阳也毅然站在了学生一边，站在了人民一边。但他没有军权，民主运动就这样被专制分子用坦克飞弹镇压下去了，赵紫阳也随之结束了其政治生命。这次学生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邓小平再也不能以“人民不让我退”为借口把持大权了，而是在《讨邓宣言》的喧嚣声中宣布退休了。

由于专制势力占据上风，因此在邓隐退之后仍然是专制制度的继续。邓在退位之时，恰当地选定了他的接班人——江泽民，这个在镇压学生运动中表现出色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一步登天，当然会投桃报李。他在给邓离退送别时对邓许下诺言：“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言之切矣！但可以想见，这话的份量至少有一半是对邓某人一个人的，十亿人民能得其十四亦可谢天谢地。因为他还要靠邓的余威、邓的铁腕继续保持政权的“稳定”。

专制时代的当权者一向是较多地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而绝少考虑人民的福利。江泽民当然也不例外。他上任伊始，许诺为人民办几件好事，最后只落得不了了之。同时，他暗下决心，强调对反对派“要除恶务尽”，大有“宁可错杀

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气魄。他表示：“要舍得花钱买平安”，但他花钱的目的并不是救济贫困中的人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之安居乐业，而是拿百姓的血汗钱装备他们的“御林军”，以更好地镇压人民。君不见，江整天张着大嘴笑吗？那正是他“外松内紧”的策略。

### 三、党主制的危害

党主制毫不例外地具备君主专制的全部特征和危害，并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

#### 1、党主制下的腐败来得快

中共从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爬出来以后，宣布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工作转移。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也给中共从经济上掠夺人民创造了良机。

中共从改革开放后十几年迅速走向全面腐败，速度之快，令许多封建王朝望尘莫及。这不是偶然的。如果说君主制度下天下为君王一家之私的话，那么，党主制下，天下就“为公”了，为多家之私了。君主制度下，君王自己当然要奢侈一点，但却不能容忍其他人为所欲为，直至包括皇亲国戚。党主制就不同了，“天下为公”了么？每个当权者都视自己管辖的领地为己有，就象拾荒人遇到了“放圈”的机会，迫不急待地干着中饱私囊的勾当。

孟德斯鸠说：“专制的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物。”中国送礼的风气尤为盛行。各级官员不能把收刮的民财全部据为己有，而必须拿出相当一部分供奉其上级，否则会失去继续收刮的资格，因此，在中国，官越大送礼的人越多，所收的礼物也就越多。中国官员的巨额财富中绝大部分是通过收礼而获得的。

江泽民也认识到腐败对中共政权的威胁，他认识到，腐败不除，中共政权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他也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但专制不除，欲除腐败，无异于沙中建楼。

#### 2、国有制是腐败滋生的温床

国有制，亦即旧称的“全民所有制”。顾名思义，它应该是以全体国民为所有人的共同所有制。何谓所有，我们必须从所有权的诸项权能谈起。民法理论认为，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至少还必须增加一项监控权能和一项救济权能。衡量一个人对一份财产有没有所有权，最根本的还不在于他对这份财产是否享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而在于他有没有收益权和最终处分权以及在处分掉这份财产前对它有没有最终监控权。那么，中国人民究竟对国有资产行使了哪些权能呢？一项也没有。人民既不知道国有资产总额有多少，也不知道每年的国有资产收益率有多高，也没有可能对国有资产的经营运作方式进行质询和表决。总之，人民对国有资产什么都不拥有，特别是被反动的户籍制度排斥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外的亿万农民，“当家作主”不过是画饼

充饥的美梦。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不会虚置。正如波兰前共产党的一位高级官员所坦诚的那样，所谓全民所有制，说穿了就是官员所有制。实行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后，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因此又在相当程度上直接表现为厂长经理所有制。厂长经理是不可将好处独吞的，他再拿出相当一部分供奉给有权任命他们的人。邓小平说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试看全国上下，先富起来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在全国亿万人民未解决温饱问题，在老人无医、儿童失学的同时，“公仆”们早就“一支烟，一两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了。“十等人”的歌谣便是对当今社会各色人等的写照，也反映了人民对社会的嘲弄与不满。

### 3、效率低下遗害社会

专制妨碍社会的进步，表现在专制制度下政权运作和资产运作的效率低下。

（1）在政权方面。由于权力的更迭无法无序，当权者不可能凭自己治国安邦的才能而当权，而是要靠耍阴谋而登上宝座。而且当权者也不可能以卓越的政绩来稳固政权，而是要时刻警惕别人篡位的阴谋。他至少要拿出一半时间来对付可能的篡位者，并每每为此寝食不安，没有心事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他制定的每一项政策，决不会把人民的福利放在首位，而是考虑怎样维护其政权。当权者不务正业，政治效率低下可想而知。

（2）在资产运作方面。“公仆”们无生财之心，有散财之能。经济体制几度改革，直到实行股份制、公司制，世界上最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已经拿来用了，却终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效益不高、大面积亏损之颓势。当局还说要深化改革，不知究竟能深到哪里去。目前的情况是，由于企业盈亏责任不明——他们也不愿意弄分明——造成大批企业“富了方丈穷了庙，和尚流落到海角”。尚存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没有积累的动力，没有使用管理技术和科学技术的积极性，自甘破落，甚至寻求发迹于破落。相信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到经济全面崩溃为止。

### 4、弄虚作假欺骗人民

专制的社会必然有过多的秘密，要保密的事远不只限于国防和外交。通过政治保密达到官僚们满足私欲和欺骗人民的目的。所有宣传工具都只报喜不报忧。面对普遍的腐败现象，却搪塞说是少数人所为，让人们相信党还是好的，并且举例说前有焦裕禄、后有孔繁森。这么一个党似乎有这么两个有良知的党员好就足以证明党好，而坏的字眼就与它没了联系。面对经济效益低、发展速度慢的现状，就在数字上作文章。不仅敢把一说成十，还敢把亏损说成盈利。税收上不去，就用贷款抵。无论用什么方法，上边压下来的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于是这般“官出数，数出官”，相互激励。可以断言，浮夸风也要继续刮下去，因为当权者不愿告诉人民真相，而且他们自己也决不会去戳穿这种把戏，直至牛皮吹破为止。

5、反过为功厚颜无耻。中共虽然号称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但没有谁比它犯的错误更多，并且不止一次地“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中共的无耻恰表现在他们善于从“错误”中找出“正确”的

理由。后任否定了前任，便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平反了冤假错案，要叫人“感谢党的英明伟大”；靠诚实劳动致富，也要引导人家“感谢党的政策好”；一遇天灾人祸，政府出面救助，更是叫人民感恩戴德，山呼万岁。按照中共的逻辑，似乎冤你是应该，穷你是本份，救你是功德。它作为执政党所作的一切好事都是一种施舍或恩赐，全然没有一点道义感和责任感。这与日本村山内阁因在神户地震中因救助不力而大受批评实在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日本人民知道，政府是靠人民奉养的，理应为人民做好事，不做事甚至做坏事的政府是必须辞职或被赶下台的。

## 6、专制造成政治、经济理论的盲区

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都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尝试的失败，使得中共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六四事件后，中共虽然对政治体制改革已绝口不提，但时时高呼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实际上只剩下一项，那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他的“坚持”已近“坚不持”了。尽管如此，它却不顾“科学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拒不接受先进的思想理论，偏要“摸着石头过河”，创造所谓的“特色理论”。显然，这些特色理论都缺乏基本的政治、经济理论功底，是“黑猫白猫”论的翻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处方的大杂烩，结果造成改革在许多深层次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却不敢突破“剥削”理论所带来的理论困扰。公正平等观念尚未真正建立，私有经济仍无法与国有经济公平竞争。企业制度改革，虽然引入了世界通行的公司制，但却没有领略到公司制的实质，没有理解“法人”的实质涵义，甚至不知道“企业”是指什么，摆不正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关系，不懂得政府在经济领域应当扮演的角色。“三个有利于”正是在这种迷茫中的鲁莽对策，导致发生了许多急躁冒进的经济行为，造成经济发展速度忽高忽低，经济资源大量浪费。

### 第三节 虚伪的民主制度

中共一向以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权力属于人民”来标示它所奉行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而实际上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 一、什么是宪法

宪法之为宪法，在于它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民主制度是与专制制度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的。尽管民主的形式可能多样，但民主的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唯一性。任何强把专制说成民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给民主划分类型也是不理智的。民主形式具有一个根据民主的内容和要求不断完善的过程。但科学的民主形式也具有普遍性。

宪法同民主制度密不可分。所谓“立宪政体”、“立宪政治”、都是以代议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的别名。因此，离开民主和民主制，就无法回答“什么是宪法”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宪法只需规定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不必规定什么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东西。实际上，也只是到了马克思那里才划分出泾渭分明的社会制度，并人为地编造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形式。即使有必要细划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话，它们也只能是民主制度的派生，而不可能超越民主制度之上。

宪法不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在阶级统治基础上产生的不是宪法，一切专制分子即使制定了宪法，也只能是“伪宪”，徒有宪政之名而无宪政之实。

## 二、中共宪法是伪宪法

中共立国不久，宪法数易其稿。宪法俨然成为中共专制的婢女。

### 1、公民权利形同虚设

尽管中共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宪法的基本内容，但实在不过是摆设而已。而且“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是在他们十分不情愿的情况下加上去的。其他公民权利也没有什么保障。这一点，每个人都可以对照宪法条文加以考察：（1）所谓政治权力和自由，不过是中共画好圈让你跳你就跳的自由；（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只能在内容是歌颂共产党时才能行使；（3）中共对宗教组织戒心十足，唯恐人们信宗教而怀疑“马教”，并不时逮捕宗教人士，取缔宗教组织；（4）人身自由没有保障，户籍、劳动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人们迁移、就业的自由。不必说“文革”期间人权备受践踏，直至今天，侵犯人权的事件仍司空见惯。其他公民权利同样没有保障，我们不再列举。只是在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正当权益上表现不错，中共党政两套班子中都有侨联、侨办等办事机构，对待华侨也热情有加，甚至奴颜婢膝。这是因为他们一是想从华侨那里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二是害怕华侨将他们的践踏人权的丑行见闻带到海外，令他们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或制裁。国内人与华侨同是国民却不同对待，这也是中共对“平等”的一种解释！

### 2、“人民”含义模棱两可

中共政权的一切机构都冠之以“人民”，中共宪法的权力主体是“人民”。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大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气象，似乎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

其实这些都是假象。在中共宪法中有两个主体概念，一是人民，二是公民。宪法中明确指出了公民的涵义，但却没有指明“哪些人是人民”。这绝不是什么笔误，而是中共故意埋下的伏笔。中共自己解释说，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与其相对应的概念是敌人。那么，谁是人民或是敌人，必须到中共那里去找答案。在中共看来，“人民性与党性是一致的”。只要你不反对中共，你就算人民；你支持中共搞独裁你就是好人民；你要是反对中共，你立刻就成了“敌人”。对人民的概念，中共完全抛弃了他们推崇备至的唯物主义观点，而站在了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即使是大资本家，你只要看透中共的本质，愿意与其同流

合污，你就不仅是人民，而且还能得到高官厚禄；即使是赤贫者，你揭露了中共的疮疤，你就成为流氓无产者，是无赖，是恶棍。特别是近年来，鄙视、冷落贫穷者的风气日益盛行，“无产者”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乍一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主权在民”的思想并无两样，实际上却有着天壤之别。西方的“主权在民”是指无差别的全体民众，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知道它包括自己。如法国《人权宣言》第6条称：“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但对中共所说的“人民”，你完全可能枉自多情。你似乎觉得你是人民，广大人民也觉得自己是人民，但要看你是否在中共那里挂了号，必须由他们决定才行。没在中共那里挂号的人民，作自我陶醉尚可，但行使权利就不行了。中共抛出“人民”的概念，就在于迷惑民众，稳定人心，从而达到其专制的目的。

### 3、坚持独裁欲说还羞

中共一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其立国之本，但若公然将其写入宪法，若明目张胆地写入“坚持党的领导”，这就与“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调子大相径庭。因此，宪法中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的字样，在宪法正文中甚至没有“共产党”这一名词，只是在宪法序言中对中共极尽称功溢美之辞，并不好意思地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似乎出自人民的自愿，似乎没有任何强制性。但这聊聊数语，便道出了中共宪法的精髓，说出了那些本应是“字缝里的字”。只要有此一条，中共的意志就可以随时写入宪法，宪法的内容也可以随时修订。实际上，宪法的制订和修改无不是在中共的指使和授意下进行的，宪法总是中共现时的最高当权者的意志的反映。

### 4、玩弄选举欺世盗名

中共以“人民代表大会制”来象征民主制度下的代议制，并宣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相应地，在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中，确实也规定了公民有普遍的选择权和被选举权，甚至对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候选人的资格要求，也宽限到了几乎没有要求的地步，似乎人人都有希望当选。其实大谬。在选举制度中，公民有投票权固然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环节并不在投票上，而在于候选人的提名以及竞选上，它们才是选举制度的核心。谁能推荐候选人呢？中共的《选举法》对人民代表候选人的提名作了如下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众所周知，中共极力限制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发展，使之仅处于陪衬附属的地位，甚至只落得一个牌子。他们几乎不可能推荐出代表候选人，几乎所有候选人都是由中共推荐或圈定的。尽管如此，中共还不放心，在候选人提名时总要在候选人条件的第一条画蛇添足般地加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通过把好入口关，保证代表们所带来的全是党的声音，成为党的传话筒。虽然在选举的初级阶段还搞什么“差额选举”，但这并不是竞选。选民们往往根本不知道候选人有何政见，能否代表自己的利益。事实上，经过中共仔细把关后，候选人也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政见。

于是选民们也就 往往从前至后顺序打勾，草率从事，候选人也常是排名在前者当选，排名在后者落选（但近年贿选之势开始盛行，情况有所改变）。在中共看来，只要选民肯选，选 谁都是一回事，于是无论谁当选，都落得皆大欢喜。选民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中共的玩偶。但对中共各级要人，只要党需要他当选，那是一定要当选的，因为选民中 不乏中共党员，上级完全可以对下级发号施令，并要求他们“服从”。由于选区名额所限，要人们往往要分散到各选区，并且要“戴帽”当选。如果他们安排要当选 的人没有当选，中共立即视为重大政治事故，予以高度重视，严肃处理。如果不该当选的人当选了，假如你还识相的话，你最好立刻递交辞呈，让他们重选，否则你 就该倒霉了，中共纪委的人晚上就会查你的经济问题，纵然你没有问题也要让你脱几层皮。最后他们还要安排重选，那时投票将会受到严格监视，三步一岗，五步一 哨，戒备森严，投票人不准交头接耳，严防结党串联。如此这般，要谁当选谁还能不当选？！由于中共严格把关，以至越到高层，选举越“顺利”。尽管如此，中共 对国家机构的重要职务，也不再实行差额选举，而实行等额选举和提名通过制了，以保证大党魁的当选万无一失。前面我们说过，中共宪法将国家主席候选人的资格 放得十分宽，但这并非普通百姓的幸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国家主席的候选人资格扩大到狗，也并不会因为人比狗优越而使普通百姓增加当选的机会。相反，将 候选人的资格限制太多，反而限制了中共自己的手脚。

通过这种选举和会议游戏，使中共的意志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党权和政权结合在一起，并以党的纪律作保证，实现党对所有国家机关的驾 御。在这里，不必奢谈什么“人大是权力机关”，它不过是中共下达自己意志的漏斗，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共的党代表大会基本无异；不必奢谈行政机关、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在行使职能时相互独立，它们都统一于党权而成为一体。中共专制可谓最缜密、最伪善的专制。

任期制是与选举制相得益彰的重要制度。中共宪法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但由于选举本身就徒有虚名，导致“任期”的“限制”更无足轻 重。每到任期即将届满，他们就会传达基本调子：换汤不换药、换届不换人，以“稳定人心”。即使个别调整，也是易地为官。这是实际上的“一日入仕、终生为 官”制，人民被完全剥夺了选择政府领导人的权利。

## 5、超越宪法为所欲为

尽管宪法已是中共意志的体现，尽管中共承诺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但中共的行动总是超越一切法律之上。它坚持“党领导一 切”的原则，其效力高于一切；它限制民主党派的发展，强迫他们承认其领导地位；它“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以便对干部实行监督和约束，保证他们为其尽孝尽 忠，另一方面，也便于他们为那些甘为其尽忠之人找到当官发财的机会，增加党的吸引力；它“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它限制新闻、舆论 自由。凡此种种，不堪累述。

## 第三章 民主主义的崛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彻底崩溃，备受压抑的科学政治经济观点必会沐浴民主的光辉随之确立。她会象三月的春风，转眼之间迅速吹暖神州大地。

## 第一节 政治的本源

关于政治的概念，历来被马克思主义所歪曲，说什么“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等等，因而政治被蒙上一层厚厚的恐怖色彩，以致许多有经历的人对政治充满厌倦，坚持“不问政治”。这种现象恰是非政治化的结果。

### 一、政治的涵义

孙中山先生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这基本反映了政治的本义。

显然，在当今社会中，政治是有层次之分的，它可以区分为社区政治、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等。但一般地讲，政治是指国家政治，它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为实现个人利益均衡最大化而在民主原则指导下建立国家，制订、修改和遵守国家法律，设立变更国家机关并监督其全部活动的总称。

### 二、政治的产生

政治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产生是人类人性化、理性化的结果。

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不存在政治。那时的人们常常会为争夺食物、栖居地或配偶等而发生纷争，解决纷争的办法也会象其他动物那样通过力量的决逐以决输赢。谁在力量上强大，谁就占有真理，我们称之为“力胜法则”。“力胜法则”的运作使力绝对服从利己的目的，因此该法则具有自然性和诱惑力。但它属于动物性的，并伴随着极大的消极性。第一、这种力的作用不是发生在价值的生产阶段，而是发生在价值的分配阶段，它与人们改造自然的力的作用和意义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第二、这种力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不仅不能带来社会产品的增加，反而可能在争斗中毁掉该产品，直至毁掉争斗双方自身。第三、该法则抑制力向生产型转移，而过多地集中于参与分配，导致社会产品的产量一直处于低水平，并形成恶性循环。第四、阻碍人的社会化发展，以致难以形成更加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随着人类智力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逐渐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力胜法则”的危害性，并警觉到在该法则下最终没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因为一个人、一个集团，其力的大小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欲使之在与其他个体的比较中永远保持颠峰地位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是最强大的人最终也会必然地沦为他人的牺牲品，而且，他牺牲别人愈多，别人就牺牲他愈烈。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就有可能在价值的分配、利用方面在消除力的影响的前提下达成互惠互利的默

契或协议，并据以处理相互之间的价值分配或利用关系。这种处理相互关系的依据，我们称之为“理”，这种处理纠纷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理胜法则”。理的中心思想是公平，理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实质性内容：第一、平等的劳动参与权，第二、劳动是分配的基本根据，第三、对合理取得的财产的所有权，第四、自由自愿的交换权等。

“理胜法则”克服了“力胜法则”的全部缺点，是人类走向成功、走向辉煌的灵魂。也可以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人会在劳动中使用工具，而在于人对“理胜法则”的自觉运用。会使用工具而遵循“力胜法则”的人不过是更高级些的动物，而且它会比其他动物都要来得可怕。随着理的产生和理胜法则的运用，政治也开始初露端倪。政治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斗争无缘，就注定要排斥暴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理的内容不断充实，政治的内容也不断完善，直至成立国家，建立相应的国家机关。这时，“理”上升为法，“力”受到国家的控制。在更高级的政治形式下，理与力的关系表现为国家以强制力保障法的实施。

### 三、政治与经济紧密联系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政治活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也为进一步调整经济关系而存在。

政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就理的四项基本内容而言，其产生的时间也不尽一致；最有可能较早产生的是“劳动是分配的基本根据”，并产生了模糊的所有权的概念；其后，随着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才产生了交换，这时人们才会意识到“自由自愿的交换权”；而“平等的劳动参与权”的观念产生较晚，它基本上属于现代法理学的内容。因为在人类生活的早期，人口相对稀少，大自然环境比较宽松，劳动对象相对充足，还没有可能就劳动参与权问题发生争执。

在理的四项基本内容中，内容最丰富的是交换。交换内容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理的内容的发展。交换的目的是使交换双方的效用都得到提高，交换现象的出现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生活最早出现剩余产品的时期，甚至在这以前。那时的人们完全可能因相互偏好对方的劳动产品而发生物物交换。当然，这个“物”主要限于生活消费品。但这种交换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是交换的频度和规模小得多罢了。如果说，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是商品的话，那么商品早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而不是一直延迟到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了“典型”意义。

交换是人类提升自我价值的重大发明，交换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愿”。每一次社会分工都促进了交换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大量出现，交换的广度和频度逐渐增加，交换信用逐步确定，于是产生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如贝、石、金银等。这时交换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从一般商品之间的交换发展为一般商品与一般等价物之

间的交换。价值的概念也逐渐确立，“平等自愿”也开始以“等价 有偿”为一般条件。

随着生产经验的逐渐丰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生产工具的巨大作用，并有了进一步改良生产工具的愿望和能力，这时社会生产的内容就从单一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中分化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次分化，再次丰富了交换的内容。

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利润的产生，并成为利润产生的必要条件。工具的使用，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生产能力，并使消费品的生产已相对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时就有可能促使生产力向生产资料的生产转移，从而为进一步改良生产工具创造条件。工具的改进再次促进生产的发展，形成社会生产的良性循环。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社会一定时期内有了一定的价值增值，这个价值增值就是由生产者的利润转化而来的。利润就是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产品的价值扣除生产成本、费用以及生产者合理的、有节制的消费支出后的价值结余。该结余在经济上最终表现为扩大了的生产规模或改进了的生产工具。当然，这里也涉及产品的价值实现问题，对此，我们假定除价格有高有低外，价值实现不成问题。于是，为提高利润，生产者面临三个问题：1、千方百计提升产品成交价格；2、努力降低费用、成本；3、尽可能节俭。特别是在生产规模很小时，业主能否做到勤俭节约是决定利润大小乃至有无的关键因素。

利润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剥削他人才产生的。特别是在事业发展的初期，生产资料的规模很小，生产也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这时不存在雇佣劳动，当然也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剥削。但利润却是客观存在的，正如今天的个体户，他们也有利润。工具是提高劳动效率的利器，也是获取利润的物质基础。人与工具的结合是人类生产的基本形式。由于工具的使用与否决定着生产者能否在这个生产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人在生产过程中是人依附于生产工具的。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资料的规模也扩大到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个人操作不过来的程度。这时，雇佣劳动的现象便出现了，交换又增加了新内容——劳务。交换的原则仍是“平等自愿”，交换的目的仍是双方效用的提高或价值的提升。为什么雇主愿意雇工？因为他希望通过雇工充分发挥生产资料的作用，产生更多的利润。他当然要支付给雇工报酬，但他权衡的基本原则是他因雇工多创造的价值要尽可能大于他支付给雇工的报酬价值。为什么有人乐于受雇？因为雇员往往不拥有生产资料或者生产资料不够发达。他自己从事劳动所获得的收益若不如接受雇佣所得的报酬多，他就接受雇佣。众多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相互均衡，交换就会在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上得以完成。在这个平衡点上劳资双方都得到最大收益，因此，无论说谁剥削谁都是没有依据的。但也不可否认，在较多的历史时期，劳方较资方处于劣势地位，因此，独立而有效的工会组织是必不可少的。

物资产品的生产领域情况就是这样，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也大抵如此。

#### 四、人的社会化与政治

在现实社会中，人从来不是仅作为孤立的个人而存在的，而是同时作为社会人而存在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总是以个人和组织成员的双重身份出现，尽管在许多场合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某个组织的成员。

组织是人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渠道。人结成组织的动因大致有三条：第一、发挥集体力量，增强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第二、维护理的运作，增进交往，实现互惠；第三、抵御外敌入侵。正如《人权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在一个组织内部，组织成员与组织的关系实际上是他与其他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组织成员根据组织契约实现互惠互利和相互救济。成员之间充满斗争、充满压迫的组织不是真正的组织。

组织契约是一个组织的灵魂，是协调组织成员关系的指针。怎样形成组织契约，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技术性问题。是靠圣贤公断还是靠武力解决？二者都行不通。首先，凭谁力量大谁说了算等于在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中又恢复了“力胜法则”；其次，依靠圣贤，而圣贤也不可能预知一切，特别是他不可能揣度每个人的思想，并使之达成相对的统一。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由组织成员协商表决。它体现了人在结成组织和决定组织事务方面的“意思自治”原则。

组织形成后，还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推举组织的领导者。这也必须是通过民主渠道才能完成的。这点我们将在国家的运作部分详细分析。

正如人与人在交往中形成组织一样，组织与组织在交往中会再次融合形成更大的组织，以协调组织之间以及不同组织的成员之间的关系。组织的融合直至形成国家，一般组织契约发展形成国家社会契约。国家是人们的交往范围相对稳定后而形成的组织，是社会契约最可能发挥作用的最大范围。国家最初总是以共同的民族传统、语言文化为基础的。

在与大组织和小组织相对应的大契约和小契约的关系上，是大契约以小契约为基础。如果小契约之间的矛盾很大，则不可能有组织之间的融合。反过来，大契约又指导和约束小契约。小契约一般不应与大契约相矛盾，但局部矛盾的存在应是允许的，小组织声明保留的契约条款适用于小组织内部，一旦突破小组织范围就立即适用大契约。这点在国际法中已经比较成熟。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组织的融合也必须是组织之间自愿的，不能是一个组织强加给另一个组织的。强制的融合是殖民主义。小组织有权单方面宣布退出大组织而保持独立；相应地，大组织有权宣布终止小组织原在大组织中享受的权利。

我们认为，就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目前的关系而言，两者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以中央政府自居而贬对方为地方政府。因为无论是大陆居民还是台湾居民，都是当地的各自的永久居民，都各自对自己的属地拥有地域权和自治权。况且，相互隔绝许多年来，彼此未尽过一份义务，又怎能向对方主张权利呢？！特别是中共，自恃拥有联合国席位，肆意干涉台湾的经贸、外交

事务，这是十分粗暴无礼的。有感于此，我们认为有相关的国际法规则 必须进行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的发展已趋向久分必合。随着国际法条约的签订和国际法则的制订，组织形式正从国家迈向国际。国家的融合，在欧洲已露端倪（目前受挫不前）。大陆和台湾当局都应顺应民心民意，顺应时代潮流，迅速实现祖国统一。

如何实现统一，应由两岸对等谈判。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不切实际的措施，都是蓄意阻挠实现统一。

当然，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可能只从社会中享有权利而不承担相应的义务。有时社会成员甚至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对具体的人来说，是不是与他加入组织的目的背道而驰了呢？不是的。对此，卢梭曾明确指出：“在社会契约之中个人方面会做出任何真正牺牲来的这种说法便是不真实的了。由于契约的结果，他们的处境确实比起他们以前的情况更加可取得多；他们所做的并不是一项割让而是一件有利的交易，也就是以一种更美好的、更稳定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不可靠、不安定的生活方式，以自由代替了天然的独立，以自身的安全代替了自己侵犯别人的权力，以一种由社会的结合保障其不可战胜的权利代替了自己有可能被别人所制胜的强力。他们所献给国家的个人生命也不断地在受着国家的保护；并且当他们冒生命之险去捍卫国家的时候，这时他们所做的是不是就是把 自己得之于国家的东西重新给国家吗？他们现在所做的是，难道不就是他们在自然状态里，当生活于不可避免的搏斗之中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以保卫自己的生存所需 时，他们格外频繁地、格外危险地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吗？”因此，真正有效的组织的形成总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增大其成员的利益的，只要成员的奉献有着法律上的 依据。

## 第二节 国家的运作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在当今社会的组织结构中，国家处于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由于各国均宣称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使得国家来自国家之外的约束较少，国家政权往往处于权力的巅峰，这就使得国家的运作很可能背离了成立国家的宗旨，使国家成为少数人鱼肉多数人的暴力工具。再加之从专制制度下走出来的人们，多 不知道国家正常的运行机制，还以为专制就象日月经天，江河流地。为此，我们有必要结合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简论国家的运作方式。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我们的论述也将以宪法为中心展开。我们认为，宪法必须具备如下内容：

第一、宪法要确认国家的目的是依法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增进全体公民的福祉和利益。这不仅体现在对公民合法行为的保护 上，而且还体现在对公民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和惩罚中，即罪刑相当。这种保护是全方位、全过程和针对全员的，它没有阶级之分、没有贫富之别，甚至不必区分敌 我。敌人的概念是超越法律之外的，必要时适用的是人道主义法则。宪法必须坚决摒弃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进行专政的观念。



第二、宪法必须确认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公民权就是人权，它的内容具有普遍性。特别是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人权规范就从国内法扩展到国际法领域。一切对人权避重就轻、强调国情的解释都是对人权的歪曲，是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和不尊重。公民基本权利应包括如下几类：

1、财产权。宪法要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对于合法私有财产，非有适当赔偿，不得收为公有。

2、平等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包括：（1）所有公民受法律平等保护；（2）公民触犯法律时，在惩罚上一样对待；（3）不许公民在法律上享有任何特权。在废除特权上，必须做到：（1）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竞争一切劳动职位，包括国家公职，取消不可思议的年龄限制。国家有义务为公民在提高能力、发展自我方面创造条件。（2）国家不以公民与生俱来的特征或生活中的偶然因素而制造终其一生的特权或歧视。而某些特征或因素包括出生地、身份、党派、升学、记功、过错等，正被当今社会当做划分公民社会等级、制造公民差别的有效尺度，这是非常反动的。

3、自由权。《人权宣言》称，“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那种“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说法，是对自由的恶意歪曲。公民自由权一般有下列几类：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言论自由、罢工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除此之外，还必须确立权利的让渡和交换的自由。

言论自由是自由的主导和统帅。言论尤其指以下两个方面的言论，一、对政治、经济等事件、局势的客观反映；二、发表自己对政治经济事务的观点、态度。言论自由、特别是新闻出版自由是人民主权的重要体现，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是人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实施“最终监督权”、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忠于职守、一心为民的重要手段。言论自由的禁区是不得反对民主制度，不得宣扬专制和维护等级差别，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等。

4、受益权。它包括受教育权以及享受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方面的一些权利。

5、参政权。即公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方面的权利。它包括选举权、创制权、罢免权，以及对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草案的复决权等。全民公决的结果，其效力超过一切现行法律。

除此之外，宪法理所当然地要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它包括：（1）捍卫国家、服兵役；（2）交纳赋税；（3）服从法律；（4）尊重他人财产；（5）义务教育；（6）劳动的义务；（7）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等。

第三、国家权力实行“三权分立”。虽然“主权在民”的原则不可动摇，但国家权力并不是也不可能由人民普遍行使，而是必须通过组建国家职能机构由少数人完成的。

国家权力无外乎三种，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在专制制度下，国家一切权力总是统一于君权或党权，因此，克服专制就必须打破集权，实行分权。“三权分立”原则正是为防止形成专制而设计的。其基本思路是：专制是一种很容易复归的政治异化现象，任何一个拥有权力的人都有可能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美国思想家、政治家杰佛逊总统进一步指出，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种权力，必须由三个机关分别行使，并且互相牵制；如果三权中有一种权力不受其他权力的约束，就必然会发展为专制。

实行“三权分立”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分割，国家权力依然统一于人民主权。以“国家权力不可分割”为借口否定“三权分立”，实际是为君主专制、党主专制寻找理由。

第四、军队必须属于国家。正义并不会自发地能够战胜邪恶，理、法也不会自发布行于众，正义时常受到邪恶的挑战，因此国家就必须保持强大的、足以威慑、制服各种邪恶势力的武装力量。国家的武装一般分为两种，即军队和警察。军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法度尊严的支柱，而警察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维护地方、部门和其他组织内部秩序的武装力量。军队就其对职能而言，其力量要足以制服地方、部门的警力。

军队是国家机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必须独立于权力之外，并成为国家权力的支配力量。军队必须归国家所有，军队进入紧急、战争状态的决定权最好由三权联席行使。军队必须只尊重现行的法律，并在一切政治纷争中保持中立。为此，军队中必须清除一切党派分子，坚决排除“党指挥枪”的情形，避免军队成为推行一党政治主张的武装力量。根据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任何政党不应该据有武装。如果政党拥有武装，就会使该党的主张超越人民的选择，就会使政治纷争发展为武装斗争。武装斗争不可避免地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却不一定能够给社会带来正义。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扩大联合国的军事力量，缩减各成员国的军队，可能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交往方面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甚至，我们有理由相信，军事力量国际化应是世界发展的必然方向。

第四、明确政党职能、规范政党行为。在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政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党的存在是必要的，没有成熟的正常制度，就没有成熟的政治制度，宪法有必要对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经历过党主专制的国家更是这样。

政党存在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增强政治活动的组织性；为竞选推荐候选人；有组织地进行政治监督。

作为普通意义上的组织，政党的宗旨、活动必须服从宪法，尊重民主原则。

有人认为，政党之间必然要保持不同的政见，否则就没有存在多个政党的必要。其实，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由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目标是唯一的，所以，各政党之间在根本的政治方向上就不应存在重大分歧，只可以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异，而且甚至这种差异也不是必要的。政党犹如企业，只是它的产品是政治行为。正如企业并不因生产相同的产品而失去分立的必要那样，即使两个政党的政治主张完全相同，也不应必然要减并为一。而且，正如经济上必须反对企业垄断那样，政治上也要高度警惕政党垄断，以促使政党在自由竞争中保持活力，并通过竞争手段，经常使政治上优秀的政党处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

就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要求一样，任何一个政党不得保留任何特权——不管它历史上有多大的功劳或过错，每个政党都应以现时的表现接受人民选择。这也是应有的“发展的观点”。

政党除忠于宪法、维护民主之外，不得坚持其他任何偏执的政治目标，不应保持过分缜密的组织结构，而应具有开放性、现代性的特点。政党必须彻底抛弃政治斗争的错误思想，而应树立政治竞争的观念。政党不能拥有武装力量。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政党越多越好。只要有相互独立的政党存在，就可以较好地发挥出政党的作用。政党活动的经费应主要来自党员交纳的党费、党有资产的营运收入及正当有序的政治捐助等。象中共这样单纯依靠财政拨款、靠老百姓交纳的税款作为其主要经费来源的做法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第五、真实、科学的选举制度是人民主权的重要体现。它与言论自由一起，共同构成民主制度的基础

任何组织包括国家欲有效发挥作用、实现组织目的，都必须建立起科学、完整、务实、高效的组织机构，并赋予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以职权，让他们行使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各项权能。组织机构的职权来自于组织成员依照民主原则实施的授权。这种授权的实质就是民法意义上的委托代理。选举的意义之一就在于通过选举，完成国民与某位精英人物这一对平等主体间的委托——代理程序。委托人是全体国民，代理人是当选的国家领导人。竞选和投票近似于要约与承诺，只是意思表示的过程和规则比较复杂而已。因此，即使组织形式上升到国家，公民与当选人之间的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也清楚地说明了民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政权是民权的派生。民权派生出政权的目的决不是为了使民权削弱，相反是为了使民权得到更好的保障。在这里，一切奴化思想都是要不得的。

选举应执行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和竞选等一系列制度以及遵循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等选举原则。完善的政党制度是完善候选人提名办法的可靠途径，并可从根本上克服少数人操纵选举、垄断候选人提名的专制倾向。选民拥有选举权。由于法律规定当选者应平等地保护选民的利益，反过来亦即选民的风险是相同的，因此，选民的选举权应该是普遍的和平等的，而且还应是直接的。为避免选民之间相互影响而不能真实反映本人的思想或者因其他外界干扰而屈枉投票，因此应实行秘密投票制度。对于候选人，他愿意参加竞选，意即他愿意接受所竞选职位所给予的报酬及荣耀，并愿意承担起规定的服务选民的义务。对当

选者来说，接受报酬是他唯一的权利，而运用国家权力只是他的义务，是他必须付出的劳务，而不是他的权利。选民投票就是在同意支付一定报酬的情况下，选择最佳代理人。在竞选的情况下，由于选票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集中于某一人，这时必须按照数量优胜原则确定当选人。数量优胜原则也是组织形成组织意志的一般方法。

选举制度也体现了时代对精英人物的肯定和渴求。事实上，仅强调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不够的，而必须看到人民必须结成组织并在组织中的精英人物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反映的就是这个道理。它体现在当今的企业制度改革中就是，仅高唱“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给工人施压、增加工人的风险，其效果必会如隔靴搔痒，无济于事，正确的做法是必须优选厂长、经理，并给厂长、经理们以相应的压力和动力。

但无论是何等的精英人物，都必须限制其任期。这是有极其深刻的道理的。美国总统杰佛逊坚决反对总统连任制，他认为总统连任制有可能导致总统职务的终身制，甚至可能出现个人专制。他主张，总统最好只任期四年，最多不能超过两届即八年。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人当选总统职位不得超过两次”。

我们认为，实行任期制，是对政权更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从被动的暴力推翻向主动的和平轮换的明智选择。一方面，使当权者经常保持作为普通百姓的切身感受，与人民息息相通，并使他经常清楚他如何走上权力的颠峰的，也让前任的功过与他的誓言经常起到激励作用，避免任期过长而衰减。另一方面，它是人民经常行使主权的一种手段，并通过选举顺利表达出民心民意，达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最高行政长官最合适的每届任期就应当为四年。

在选举中确实要有所耗费，但它是值得的。它总比积重难返、爆发战争要经济得多。

当选者与人民的关系仍是平等的。当选者有权辞职，人民有权对当选者的政绩指点评说，直至要求他下台。限制言论自由，甚至镇压批评者是典型的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虽然行之有效，但它不能代替来自民间的舆论监督。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民都最有监督权，而且来自人民的监督也最有效。

当前，中国上层的选举如同虚设，农村的选举往往被认为是自由的选举。而农村选举中出现的乌烟瘴气，让不少人认为中国不适合进行民主选举。这种看法是非常短视的。必须看到，农村的选举仍然是原始状态下的选举，它没有成熟的政治制度作基础，没有自由的政党参与运作，而此时希望它能健康发展，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第六、国家机构及职能。按照三权分立的分权思想，国家应当设置三种相应的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美国的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1、立法机关，它是指国家的议会，亦即国家的代议机关。它通常拥有两项职权，即立法权和监督权。其中，立法权为其主要职能，监督权为其次要职能。立法

就是指国家通过立法机关制订、修改和废除法律的全过程。法律就是“社会契约”。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疏通来自民间的提案渠道。同时，赋予议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它体现了两个机关之间的制约和联系。议员由各党提名推荐，公开竞选。立法机关的组织制度应实行评议表决制，每个议员有平等的表决权。而议长有两个表决权或者没有表决权都无关紧要。

2、行政机关。它是国家的政府，其职能是对国家日常事务，包括内政、外交、国防、财政、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卫生、科学、交通、建设等各个领域事项进行广泛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为保护、实现和发展人的权利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政府的活动必须具有合法性、公正性和普惠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政府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繁重；另一方面，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许多事务正不断让位于民间，由民间机构来完成。这是政府职能发展的两个趋势。究竟哪些事该由政府办、哪些该由民间办，除了法理上的根据外，还应当按照经济原则进行调整。

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代理机构，其代理活动是有代价、有成本的，这就有必要对政府的运行成本进行经济价值分析。代理与亲躬相比，虽然弥补了亲躬的一些不足，但也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缺点：一是代理者往往不如亲躬者责任心高，被代理者还要付出监督成本，这就有可能使得总成本过高；二是代理者仍是普通的人，并不因以政府代理的名义而超凡入圣，就可解决一切问题。另外，由于政府代理的垄断性存在固有弊端，也使得我们在作出选择时还应当甄别考虑广具竞争性的民间代理。因此，我们要打破对政府的盲目崇拜、迷信和依赖心理。在界定政府职能方面，应采用民间为先原则，即在经济上有效益、能够利用利益驱动机制诱使民间能完成的事业应尽量交由民间完成，而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亏本，但社会效益显著的事业，则应由政府来完成，政府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政府的投资往往集中于对公共性、基础性和救助性事业及工程设施的建设等等。

另外，政府的职能一般表现在为公民实现权利创造条件上，而不应越俎代庖，直接代为实现。政府应充分注重发挥民间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由于政府行为和民间行为在性质上存在着差异，因此，政府事务与民间事务应尽量避免交叉。因为在交叉部分可能造成不公平竞争，以致破坏掉自由平等的经济环境，侵害了民间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政府作为公共权利的行使者，必须承担起对应向国家和公众负有义务的责任人主张权利、保障权利的实现等一系列事务。

政府掌握着社会的财政大权及其他多方面的重大权力，政府的活动必须具有政治透明度。政府作为执行机关，应当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实行首长负责制。

3、司法机关。它主要指国家的法院，其职能是依法审查各种具体行为的合法性，对合法行为给予坚决有力的维护，对违法行为给予恰如其分的制裁。

司法制度应建立和完善下列制度和原则，即：律师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独立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法官自由心证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辩论原则、直接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及不告不理原则，等等。

在“三权分立”的总的原则指导下,如何具体构建我国的国家机构,应博采众长,充分论证,但也不能不伦不类。而且,国家机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任务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使之始终保持精简、效能、廉洁的精神风貌。

## 第七、树立权利本位主义的法律文化观念。

权利是指人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实施利己的行为和主张能被他人普遍尊重和认可的程度和范围,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自由和承受行为后果的规则。权利乃天赋而非法定。它先于国家,归于自然。只是在国家产生后,权利才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保障。权利之于人,其第一要义就是它具有利己性。人没有了权利,必然也失去了自由,也就已沦为了奴隶,因此,每个人都应当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抗争。这是光明正大的、正义的事业,而不是猥琐的、见不得人的丑事。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包括你、我、他都在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这不仅是我们在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也是我们在道德意义上的义务。

根据权利的概念,我们应理解到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权利应当依靠个人的努力去实现;二是相互尊重他人的权利;三是对侵权行为实施制裁。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平等的、稳态的和有序的社会体系。

相应地,义务是指在平等的基础上,在权利明确之后,义务人为换取他人的权利而对自己权利的主动支付或在侵犯他人权利后以自己权利为代价的被动割让。因此可以说,义务是形式,权利是内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范畴和层次。义务仅体现在人与人具体的交往过程中,没有人的交往,也就没有义务的发生。而权利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全过程中。因此,在这点上,权利和义务并不是对等的。

长期以来,我们社会中流行着义务本位主义的思想,这是愚民主义思想灌输的结果。相对于权利而言,义务具有利他性。因此履行义务常常不会象享受权利那样化为一个人自觉的行为,甚至有时是被强制的。所以,以尽义务作为人生目标的设计存在先天不足的特点。而且在权利不明的情况下,尽义务应到什么程度难以把握,甚至肝脑涂地、效尽犬马常常犹嫌不足。

义务本位主义思想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以当作他们教化他人放弃权利、承担义务的理论工具,以便他们坐享其成。这在历史上已有了惨痛的教训的。

事实和逻辑都证明,社会以权利为本位,人们以权利最大化为目标,社会就进步;社会以义务为目标,人们以义务最小化为方向,社会就衰退。以权利为本位,舍去义务的概念仍能自成体系;以义务为本位,离开权利的概念就难以顺理成章。

权利本位主义的思想观念体现在法律文化中,有如下的特征:1、以平等为特征的权利观念在法律文化及法律制度中居主导地位,是权利与义务关系中的主词;2、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成为普遍的观念模式和行为趋向。这不但表现在人们要求把正当的利益主张以权利和自由的形式确立在法律中,而且还表现在对于一切侵犯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给予法律上的制裁。3、主张法律至上,法律被称为秩序与公平的综合体。

权利本位主义法律文化同以自然经济模式为内容的生产方式、以民主与法制为内容的政治制度、以理性主义为内容的思想观念具有内在的联系，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级形式的法律文化类型，而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文化只能是旁门左道，是人类社会中的精神垃圾。

第八、国家经济制度必须在保护所有权制度下坚持自然经济模式。

我们认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不是什么私有制或公有制。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私有制并未给中国带来空前繁荣，并未显示出私有制的特殊魅力，同样，中共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已经日暮西山，失去生机，使中国几次失去了经济腾飞的良机，付出了极大的机会成本。在我们看来，健康的政治制度是保持经济旺盛活力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相反。政治制度决定社会的精神风貌，并决定物质生产的全过程。即使把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相联系，我们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只能老老实实在地采用自然经济模式作为国家的经济制度。

在自然经济模式下，既不排斥私有制——这是显而易见的，也不排斥国有制——这是我们的主见。国有制和私有制并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相通的。问题的关键是使国有制成为真正的国有制，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而不是实际上的官员所有制或厂长经理所有制。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从所有权与企业等基本概念谈起。

我们认为，企业并不是指企业的厂房、机器，也不包括企业的职员。企业是指依据对具体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发挥所有权的各项权能，从事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求实现收益权的投资人。只有把企业看作是人是组织，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企业作为法律主体的全部内涵。

从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全部历程来看，最初是个体无雇佣企业。投资者个人投资、个人劳动，独立承担盈亏责任。其后是个体有雇佣企业。投资者个人投资，在自己参加劳动的同时雇佣他人参加劳动。第三是合伙企业，它是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投资，并按约定分担盈亏责任的企业。合伙企业也分有雇佣和无雇佣两种类型。最后是法人公司，它是由投资者所结成的组织，它一般是有雇佣的，甚至大量雇佣各层次人员，直至投资者把生产资料的经营权能都转交给了经理人员，并通过经理人员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能转交给了雇佣工人。

必须注意，上面所说的转交，其内容并不属于权利。所有权的权能确实存在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情形，这特别表现在象租赁这样的法律关系中，承租人对出租人的财产享有使用权，即拥有使用和不使用的自由，承租人承受权利运用的法律后果。但在上述雇佣关系中，受雇人并不享有雇佣者的财产权利，不享有权利运用的自由，也不承担受指使的行为的法律后果，他只是替代了雇佣者在行使权利时所必须付出的劳动。付出劳动不是在享受权利。因此在企业中，并不因雇佣的存在而发生权利分离的情况，亦即并不因工人使用机器而发生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也不因经理人员主持企业的经营管理事务而发生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因此，我们多年都在探索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模式并不正确。

从合伙企业到公司，都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的共有制。共有的主体是组织成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结成组织目的是为了扩大和保障组织成员的权利。同样，企业发展为组织，也丝毫不能抹杀或含糊所有权，只是所有权的运用方式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仍是企业意志的结果，是由投资者按照规定程序决定形成的，只是形成企业意志的过程和机制复杂了，不再以各个独立的意志为意志。但是，投资者始终保留着一些独立的体现最终所有权的基本权能，如最终监督权等。

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关于公司是组织、是法人这一点已得到普遍认识，但对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包括谁，法人的意义在哪里等问题却迷茫万端。由于在经济理论上纠缠不清，导致他们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病症乱开药方。他们显然看到，企业作为政府附属物的体制已是穷途末路，于是他们认为，企业一旦成为独立于政府的企业法人，拥有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法人财产权，企业就会有生机和活力。但直至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种种尝试均不尽人意。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所有权理论和企业理论严重偏失的必然结果。这些理论的错误和漏洞表现在：一、虽然承认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但却无视全民的所有权，并舍所有权不谈，而大谈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法人财产权；二、在企业是主体还是客体的认识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或者即使认为企业是主体，也局限于认为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厂长、经理是法定代理人，他们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处于中心地位等等。他们没有认识到，即使是国有企业，企业职工只是所有者的一部分，他们远不能以当然的所有者自居（实际上也没做到）。对全民来说，企业职工乃至厂长经理仍不过是全体所有者的雇佣工人或经营代理人。三、没有认识到企业作为政府附属物的根本性错误在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科学、不合理，而不在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对企业所发生的必然联系。四、对企业的放权矫枉过正，“企业成为法人”的结果，却把政府——国有资产的代表人——堂而皇之地排斥在企业之外，从而必然导致产权约束软弱，企业运行注定仍不会正常。对此当局几乎已无计可施。五、厂长、经理负责制，确立了厂长经理在企业中的绝对地位，厂长经理成为企业，全民所有制从官员所有制蜕变为厂长经理所有制，并促使为数不少的厂长经理利用该所有制所赋予的职权以各种手段化公为私，变为真正的个人所有制。这种状况导致企业内部各种矛盾激化，厂长经理不思进取，干部职工混天聊日，企业发展失去动力。

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到企业成为独立法人，可以称得上是一场革命。但企业成为法人、拥有经营自主权以后，并非就可以万事大吉。而当局过于看重企业成为法人的现象，却没有与所有权相联系，来正确理解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刻内涵。从企业发展的历程和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来看，企业经营自主权，是企业所有权所派生的一项权能之一，不唯成为法人才会拥有，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个体企业、合伙企业同样拥有。企业成为法人的实际意义，在于使企业的活动进一步纳入法制的轨道，企业的行为进一步受到规范，企业活动的透明度增强，债权人和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同时为企业承担有限责任创造了条件。企业有限责任制度的实施，一方面鼓励了投资，扩大了投资规模，推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因承担无限责任在企业破产时因追偿债务所带来的社会混乱。



根据民法原理，共有制有两种形式，一是按份共有，二是共同共有。在一般的股份制企业中，通常是按份共有制，但对国有企业，我们只能理解为共同共有制，而且这种共有的范围特别大，一直扩大到整个国家。尽管如此，企业发展为组织，无论其规模大小，其运行机制都与国家作为一种组织的运行机制相通的。所不同的是，一个人一般只能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但他可以成为几个企业的投资人。企业的运行离不开企业章程，它是所有者之间的约法。企业内部也要有代议机构和执行机构等，并根据各机构与所有权的关系科学划分事权及职责，严格贯彻执行。这也是我们在企业改革中应当关注的重点。

因此，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不赞成急于把国有资产量化分配到每个公民，以求迅速完成从公有制到私有制转变的主张，更应警惕有人借推行私有化为名把本应属于全民的财产堂而皇之地化转到少数个人名下。比较适中的步骤大概是成立全国性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它代表全民行使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其基本职责是：一、对现存国有资产作为国有资本金进行登记和管理；二、对国有资产的收益进行登记和管理；三、通过产权交易市场不断优化国有资产结构，进行投资和再投资；四、担任具体企业的股东，并根据国有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的份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在这里，企业不涉及“企业经营自主权”问题，而只涉及经企业投资者授权并监控的“经理经营自主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所有权理论和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去指导、规范和处理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债权人、公众和政府等多方面的关系。

由于全体人民才是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也只是代理机关，因此，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工作必须公开，接受人民的监督，让人民行使最终监督权。国有资产的收益，应有计划地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救济贫民，改善人民的福利。

根据我们对政府职能特性的分析，我们认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不宜作为政府机关，不能拥有行政权力。它可以由中央政府任命机构首长，但在法律上应保持普通的民事主体地位。相应地，政府应从着重抓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中解脱出来，真正实现政企分离，并与此相适应，进行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确保政府面向全社会提供高效、廉明、公正的服务。

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总是相对偏低，运营成本相对偏大，大规模的国有制不是长久之计，但通过这种改造后，可以给我们留出时间逐步调整，避免一步到“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如何确保在这一步骤的实施过程中使国有资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关键在于能否严格依法管理，否则再好的措施都不过是一文废纸。

第九、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社会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福利制度，使公民切实享受到物质救济权和保障权。

保证效率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它必须体现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这就要求国家在有效保护权利的政治法律环境下，保护平等自由的竞争风气。竞争是催人奋

进的兴奋剂，是促进企业改进技术、降低消耗、融洽与社会关系的无穷动力；竞争有助于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既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英雄，也使一部分人成为竞争的失败者，甚至生活难以自保。这种情况对社会稳定是有危险的，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建立起必要的福利制度，为这些人提供生活保障。而这又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这就是公平，其准确含义就是一定条件下的均等。实现公平，也是我国历代开明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所追求的理想。

福利制度一般是通过财富或行为课以税收，通过对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来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一直也是相对的。

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成功也证明了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所料不及的，而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视而不见，装聋作哑。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可以沟通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竞争中，没有人会绝对保持资产者或无产者的地位。所以，竞争在制造了社会差别的同时，也制造了相互理解的社会基础，并促使通过税收建立福利社会的设想变为现实。当然，税收过高、福利制度过于深入会抑制投资，会使人懒惰、不思进取，亦即过于追求公平会牺牲掉效率，因此，必须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结 语

专制已到穷途末路，民主乃是大势所趋。为实现从专制向民主的社会变革，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理念，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没有人能发展出终极真理，也不必奢望某个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领袖人物君临凡尘，同时我们要警惕那些用心不良的人以“神”自居、统治人民。民主是产生智慧和修正错误的最可靠的机制。

《史记·商君列传》有云：“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每一个正大光明的人，都不应拘泥于前人的思想，在前人定下的框子里去刻意发掘出什么新思维，而应该在吸取前人思想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大胆地去发展，形成更先进的思想。我们不必迷信任何主义，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僵化的教条，诚恳地面对现实，面对世界，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思想，去迎接人类历史上的更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早该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希望中共当局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不要做牺牲他人而最终会牺牲自己的卫道士，而应当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坚决抛弃“四个坚持”，彻底进行政治改革，力争做中国民主制度的功臣，而不是历史的罪人。

我们仍应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看待人和事。虽然中共坚持专政立场多年，虽然中共党员中出现了许多的腐败分子，但这不完全是人的过错。坦诚地说，就在倒下的那些腐败分子当中，也有不少算得上是社会的精英人才，是专制制度在象魔

鬼一样引诱人们害人害己。我们相信大多数中共党员还是有良知的中国人，因此，中国的政改没有抛弃中共，希望中共还要自弃。

中国政改的捷径就是把中共一分为二，然后以此两党为基础展开竞选。这样，中国政坛在未来数年内将仍是原中共要员掌握政权，政权过渡比较平缓，而政权的运作机制已迈进向民主。这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中共，都称得上是较佳的出路。这样的机会不会保留太久。

我们奉劝专制者不要迷信武力，俄总统委员会成员派因说：“前苏联境内冲突的主要教训是，军队不可能战胜人民！”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晚八时三十分搁笔